

明钱穀《纪行图册》张复《水程图》之大运河现地研究与 GIS 呈现(之四)*

简锦松 廖泮铭 王 勇 张淑君
唐 宸 严 程 谢定纮

摘 要 钱穀《纪行图册》以王世贞隆庆四年(1570)六月《适晋纪行》为蓝本,绘成仓山小祇园至扬州扬子桥三十二幅;张复《水程图》因王世贞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入领太仆之役,附舟而北,绘成邵伯至通州水程五十二幅。两卷皆以写实为之,在明人画中堪称独绝。文章以现地研究法进行三项处理:一、此次王世贞北行,正在隆庆新河既成,沔河之议方生的明代大运河变动期,文章将二人所经过之水程全部数字化;二、钱穀自言“维欲记其目前真境”,文章利用明清旅行日记、方志、古今地图及笔者现地考察所得,将各图逐一解说,指出图面所绘内容,验证画者写真实践的程度;三、此八十余幅之价值,如同发现一大箱明代的拍摄影带,文章发挥其自身的影像本色,形象化地指出明代大运河的真正面目。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明代大运河; 现地研究; 钱穀《纪行图册》; 张复《水程图》

分类号 K928.6; J222.2/.6; TV91

作者简介 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廖泮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 张淑君,上海大学硕士,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唐宸,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严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谢定纮,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4.3 临清至天津——南运河

南运河,指临清至天津这一段大运河,全程利用卫河的天然河道。卫河自辉县南、合河镇北,接受了百泉河、浑水河与沙河三条上源之后,进入新乡县,在大名府浚县(今鹤壁市浚县)淇门纳淇河,又纳汤河(虻牛河)、安阳河,再于大名、馆陶两县界的徐万仓村会漳水,合流至临清。此后称为南运河,元名御河。南运河至天津直沽后,合通州南下的白河成为海河,于塘沽注入渤海。

* 该文为连载,此为第四部分,文中表、图接续第三部分编号。第一部分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1期第50—60页,主题是《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简要说明,以及这两幅台北故宫所藏珍品与明代大运河的关系,从而提出本文的现地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2期第50—115页,主题是钱穀《纪行图册》三十二帧逐一图片解说,中间补入钱穀《白岳游图册》四帧。第三部分到第四部分,主题都是张复《水程图》五十二帧的逐一图片解说,第三部分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3期第59—128页。

卫河自临清以北,历清河、夏津、武城、恩县、故城、德州、景县、吴桥、东光、南皮、交河、沧县、兴济、青县、静海等县,临河的城市有武城、故城、德州、东光、沧州、兴济、青县、静海、天津。经过的驿站有甲马营驿、梁家庄驿、梁店驿、连窝驿、新桥驿、砖河驿、乾宁驿、流河驿、杨柳青。这一段的航程向来十分稳定,张复《水程图》也是逐城、逐驿,每站作画。各图中只有郑家口不属于城驿,杨柳青是刚刚移废的前驿站。

表 6 是南运河全部的里程,从临清州至天津共计 456.007 公里,第一站临清州的累计数为 1222.829 公里,这是从杭州得胜坝京杭运河起点累加的,如果只计算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从太仓累计,则为 1006.229 公里。终点天津的累计数为 1678.836 公里,如果只计算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从太仓累计到天津,则为 1562.236 公里。此外须注意者,明代从和合驿到李二寺的河道,在今沙古堆以西的部分,以及李二寺到张家湾、张家湾到通州潞河驿的河道,现在都已发生极大变化,大部分河道消失,表中所列数据是据早期地图及文献推算。

表 6 临清至天津里程表

序号	图名	里程累计公里数	两站距离	各站 GPS	备注
水-30	临清	1222.829	0	36°50'32.70"N,115°41'56.28"E	以鳌头矶为代表
水-31	武城	1270.584	47.755	37°9'6.71"N,115°52'37.42"E	以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武城县西门为代表
水-32	甲马营驿	1284.184	13.6	37°13'52.71"N,115°57'15.23"E	以甲马营浮桥东岸(参照张复图)为代表
水-33	郑家口	1298.546	14.362	37°20'21.30"N,115°58'38.89"E	以郑家口浮桥西岸为代表
水-34	梁家庄驿	1312.941	14.395	37°22'14.60"N,116°7'0.67"E	已迁村,以大梁庄近运河处为代表
水-35	德州	1344.018	31.077	37°27'28.10"N,116°17'7.71"E	以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广川门为代表
水-36	梁店驿	1384.189	40.171	37°37'35.96"N,116°22'8.08"E	以长江路底运河边为代表
水-37	连窝驿	1419.076	34.887	37°47'48.76"N,116°28'5.73"E	以吴桥县连窝镇东岸为代表
水-38	新桥驿	1462.351	43.275	38°4'3.89"N,116°34'7.23"E	即泊头,以鼓楼东之河岸为代表
水-39	砖河驿	1501.433	39.082	38°13'18.72"N,116°47'15.89"E	依张复图位置,向南微调
水-40	沧州	1523.405	21.972	38°18'41.08"N,116°50'53.61"E	依张复图西门外运河东岸为代表
水-41	乾宁驿	1548.66	25.255	38°28'19.03"N,116°53'8.56"E	依张复图西门外运河东岸为代表
水-42	青县	1562.701	14.041	38°34'28.63"N,116°49'24.57"E	今青县,依张复图微调
水-43	流河驿	1583.388	20.687	38°41'21.99"N,116°51'18.14"E	以流河旧桥为代表
水-44	杨柳青	1657.084	73.696	39°8'0.52"N,117°0'17.35"E	以杨柳青古镇地标代表
水-45	天津杨青驿	1678.836	21.752	39°8'49.11"N,117°0'17.17"E	以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交会为代表

水-31《武城》(图 130)

出临清而北,最先见到武城县,这是以孔子弟子子游弦歌治县而闻名的古城。

作为南运河的卫河,现代已对之做了整治,河上重建的大堤,每两堤相距至少约一公里,有时达二三公里,我在《明代大运河诗文空间概念之新解读》一文中曾以渡口驿为例说:

渡口驿之地,今为渡口驿乡,分东渡口驿、西渡口驿两村,中间为大运河通过,从大运河的东西堤上计算,两村相距 975 米,中间有双线道公路相连,公路的中央有一座水泥桥[中心点为 37°3'13.16"N,115°50'22.24"E],桥下的卫河,宽约 32 米。^①

① 见简锦松撰《明代大运河诗文空间概念之新解读》,《台大中文学报》第 58 期,2017,页 1-52。



图 130 《水程图》之《武城》

渡口驿属临清州,在武城县之南,该地卫河只有 32 米宽,两堤之间却宽达 975 米。

武城县的卫河大堤也相似,据清山东省测绘局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测绘的《山东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武城县》幅,当时武城县西关渡口的卫河两堤相距仅 124 米,而现在新建的大堤相距 703 米。明清武城县本来是临卫河而建的城,现在全部都被拆迁到新大堤之后了。

明清的武城县城,全部在运河旁的河滩地上,今旧武城大桥全程贯穿的土地,就是武城老县城东西向的中央大街。旧武城大桥在 $37^{\circ} 9' 8.44''N, 15^{\circ} 52' 34.27''E$ 处越过卫河之后,大桥的西桥头,就是明清武城县西关渡口的对岸(图 131)。



图 131 旧武城大桥,自东桥头($37^{\circ} 8' 57.13''N, 115^{\circ} 52' 52.77''E$)向西拍摄

由于西门是武城的正面方位,张复图中的城门就是西门,名为治平门,城楼为映碧楼^①,隔河就是河西街^②。张复应该是泊舟在卫河西岸,向东取景,所以画中的主题,有武城县的西城门、城外西门大街、金龙四大王庙、西门码头与进士牌坊^③等,西门大街末端还有石码头,颇为精致,可见此地之富。

崔溥《漂海录》云:

十六日,……至武城县。河抱城西,隔河有进士二门,又有祈雨堂。彻夜行,至甲马营驿。^④

“祈雨”为龙王之事,此当指金龙四大王庙;“进士二门”,即图中临河的两座牌坊,进士门乃为褒扬本县出身的进士而立之坊门,崔溥过武城县并未停船,所以说是隔河所见。张复图的坊门中央站着两人,一老者着红上衣,有官员气象,旁边一位屈着身子倾听。

南运河这一段河道的岸线,呈现突出而转折的形状,张复注意到了,并且仔细画出。同时他也画出了金龙四大王庙后的驿路,以及驿路上必有的铺舍,画中这一个铺舍应是西关铺。

武城县西门外这片街道究竟有多大?现在卫河水宽 103 米,明清时期应没有这么宽。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中,河宽 65.5 米,从西门到渡口码头有 128 米,换言之,有一百余米长的空间,可容纳画中的市廛。不过,若以情况相似的明代潼川府来比较,潼川府南门(31° 5'4.98"N,105° 5'11.88"E)到凯江北岸的石码头(31° 4'56.29"N,105° 5'14.96"E),其间作为商业街的“顺河大街”,实测为 286 米。图中的城门洞微向右偏,表示渡口并不在城门的正前方,街道有明显的转折,如此一来,将使街道更长,市廛的占地面积更广大。武城西门外向有“刷市”之称,依图中繁华景象看来,此间街道的长度也许不少于 200 米。

水-32《甲马营》(图 132)

张复作画,基本上皆以运河的东岸、北岸置于图的上方,换言之,入京的方向是自图右而图左。本幅相反,因甲马营驿乃在卫河东南岸也。如《山东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武城县》截图(图 133)所见,一般地图都是以北为上,张复《甲马营》图则以南为上,笔者在数字化时采用张复的视角,所以地图中的文字皆为颠倒。图中的蓝色线是卫河,河形与二万五千分之一图不同,在这组地图中,常常如此。红色线是现代卫河大堤,清代以前的甲马营,现在全部被划入堤内的河川行水地,人户完全迁出,另于大堤外新设甲马营村与甲马营镇

然而,就如图 134 所示,卫河两侧本来就是高岸,在明清时代,卫河堤就利用两侧的岸形修造;当年的武城县甲马营镇,就在东南岸的这片高地上,然后临河设置甲马营水驿而成为大港埠。

现在卫河上架设了浮桥以通行人车,长 90 米,与河宽相当,照片中河水仅存一线,是因为距离武城县北 2.8 公里处,新建了祝官屯卫河节制闸,把河水拦止在闸门以南,闸门以北的河段只余细流。甲马营浮桥以北,更完全变成数十公里干河。

回到张复的图上来,图中第一醒目的是“甲马营驿”四字,张复把图名写在这座建筑旁,依他在多幅图中使

① 见[明]尤麒、陈露纂辑《嘉靖武城县志》(明嘉靖刻本),卷 3,页 29a:“国朝成化初知县姚显区画筑建,正德九年知县饶瓚重修之,嘉靖庚寅秋,河决冲颓百余丈,知县王时雍、典史薛庆重修之。戊戌夏,复大水,城颓尤甚,知县许迁乔再加修饰。城周四里许,高二丈,阔一丈九尺,池深一丈二尺,阔三丈,城有四门,门有楼,东曰生光楼,西曰映碧楼,南曰舜阜楼,北曰拱极楼。”

② 见《嘉靖武城县志》,卷 3,页 33b:“河西街,卫河西岸,为南北通衢。”按:此即驿道。

③ 见《嘉靖武城县志》,卷 4,页 25a:“东昌郡守陈、宋二公生祠,邑侯谢公庄祠,在县治西门外。”按:陈儒祠建于嘉靖九年,宋守志、谢梦显二祠建于嘉靖三十六年,皆为治水建堤有功者。

④ 见《锦南集》,卷 4,页 47a。

用的体例,这座建筑便是该驿站。前文笔举出山东青州的青社驿古迹为例(见本文第三部分图 110)^①,与本图互证的话,驿站的形制更为明确。甲马营驿左边的建筑,是甲马营递运所。



将止泊,不用帆亦不用纤,投篙而已

图 132 《水程图》之《甲马营》



图 133 《山东省二万五千万分之一地形图 武城县》之甲马营与现况对比

^① 见《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3期,页111。



图 134 甲马营现况

甲马营的交通地位重要,而明清本地居民为了应付交通所带来的徭役,也非常痛苦,从《嘉靖武城县志》的“徭役”一节可见:

水路由临清抵德州,陆路由临清抵故城,俱为必经之地,甲马营驿递虽为所属,而两地策应未尝少减;上官陆行者,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里甲雇觅,费用不贲,邑疲而地复冲,亦难乎其为民矣。^①

水-33《郑家口》(图 135)



图 135 《水程图》之《郑家口》

① 见《嘉靖武城县志》,卷2,页13b-14a。

本幅画郑家口,《雍正故城县志》云:“郑家口镇,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临卫河,居民聚集。”^①图中的河岸形状与《乾隆武城县志》之《郑口风帆图》相同。从现地看,张复所画而武城县志所图之处,大约南起于今郑口运河桥的西桥头(37°20'19.75"N,115°58'25.81"E),北止于现代所开凿之青年干渠旁(37°20'31.21"N,115°58'45.12"E)。以现运河大堤计算,两点之间长720米。此区现在开发为带状的运河风情公园。至于该景区中的郑家口挑水坝(37°20'15.06"N,115°58'12.54"E),在张复图以东约360米,没有在图中。

张复经过郑家口并未停泊,岸上有嘉靖元年所建的真武庙、嘉靖二年所建的观音院,观音院尤在河头,但图中屋舍并未对之加以识别。因此,张复作图的目的,应只是取其地当直隶、山东交界,又为德州、武城之界,且岸形弯曲,有攻防形势而已,图中也确实重点突现了这一地形特色。

《光绪故城县志》指出,河间府有关隘四处:郑家口镇、三朗镇、四女镇、方堽屯四镇。虽然并列四镇,然而前临卫水,又有曲流,其紧要处,实惟郑家口而已。^②魏源《圣武记》也引顾祖禹说:“今日南北咽喉在于运河,而山东扼其要,能为幽燕利害者,必于山东郑镇,去临清穷日力可到。”^③

至于图中背景之山,绝无可能。张复大概是想画太行山,但是太行山脚去此已193公里,太行山顶去此多在260公里以上,距离太远,实际上完全看不见。

水-34《梁家庄驿》(图136)



图136 《水程图》之《梁家庄驿》

① 见[清]敖立榜修、秦永清纂《雍正故城县志》(清雍正五年刻本),卷1,页21a。又,卷1,31b:“真武庙三,一在县西南郑家口,明嘉靖元年建。”又,卷1,页35a:“观音院,在郑家口河头,明嘉靖二年建。”

② 见[清]丁灿纂修、张焜续修《光绪故城县志》(民国10年重刊本),卷2,页1a-2b。

③ 见《圣武记》,卷8,页41b-43b,《乾隆临清靖贼记》之结束语。

本幅以梁家庄驿为主,以故城县城为副。梁家庄驿之建筑造形,与《甲马营》图完全相同,张氏也同样在旁标写名称。本图与《甲马营》图还有另一个相同点,即此间也有一艘运河船下帆收纤来泊。不过,这次船夫用的是大枋长桨。大运河上有“水浅则撑舟,水深则棹舟”的谚语,撑舟用篙,棹舟用桨。甲马营驿外河水浅,故舟人立于船前用篙;梁家庄前水深,故舟人在船后用桨。

梁家庄驿,又名梁庄水驿,明吴与弼《登德州梁家庄驿楼》诗云:

一赏熏风瞰水楼,楼头清兴暂相留。明朝知隔几程驿?绿树人家记德州。^①

可知驿楼临河而建,正当驿路渡口处,但它的地址在哪里呢?

《乾隆德州志》称:“梁家庄驿,坐落故城县河南梁家庄”^②,其意为“故城县卫河南岸,隶属德州之梁家庄”。卫河南岸之梁家庄,“天地图”“百度地图”等当中皆有二个,一为大梁庄,一为小梁庄。

现在本区的卫河被大幅度截弯取直,已经看不到张复图中的折曲场景,但是,民国23年(1934)印制的《河北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故城县》幅,还保留着完全相同的弯曲形貌。特别是张复在驿楼后面卫河南岸和驿楼对岸伸出部分各画了一个转折,正好呈现两两相对的形状,非常准确传神,这在五万分之一地图中也看得很清楚。由此,可定位梁家庄驿坐落于今之大梁庄,约于 $37^{\circ}22'14.40''N$ 、 $116^{\circ}6'0.67''E$ 之处。

不能小看这个两崖相对的特征,因为只有利用这个折曲的特征,才能够确实为梁家庄驿定位。笔者在做现地研究时,经常听到支离无良之人,动辄以古今山河地形变化相讥,不知在公元1500年之画家与1900年之地图测绘家眼中,实无变化也。

北岸之故城县城与护国寺,张复都以远距模式处理,实测距离1200—1300米。护国寺系元时古刹,旧临卫河,曾两度迁入故城县城,明隆庆中才又迁到城外西南。^③张复经过时,寺庙新建成,十分醒目,所以特别画出,而图中的位置也正好在县城城外的西南方,图文正好互为参证。

本文从浒墅关以来,介绍过大小浮桥相当多,如浒墅关口应有之浮桥,扬州有挹江门及钞关前浮桥、缺口门及门外浮桥,徐州有大浮桥万会桥、小浮桥云集桥及弘济桥,张秋有谯楼浮桥,东昌府有北门浮桥和临清的三个浮桥(一为鳌头矶与旧州城之间浮桥,二为南板闸外卫河大浮桥,三为清源驿旁浮桥),德州亦有广川浮桥,可知明代在重要交通点设置不少浮桥,但浮桥技术并不普及,各地驿路仍以摆渡为主。朝鲜王朝极力搜集朝鲜正祖设置舟桥司,定舟桥之制,并亲撰《舟桥指南》一书,并于正祖十四年(1790)在汉江实验性地组造了以80只船组成的大浮桥;^④又命舟桥司进《舟桥节目》,详述技术,后来也不了了之。今日山东黄河上也新设不少浮桥,故以照片介绍梁家庄浮桥于此(图137)。

① 见[明]吴与弼撰《康斋文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51册),卷5,页18a。

② 见[清]王道亨修、张庆源纂《乾隆德州志》(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卷5,页30b。

③ 据《雍正故城县志》,卷1,页33b:“护国寺,系元时古刹,旧临卫河。明洪武十七年迁于文庙之北,成化二年筑城,乃在城内永和门东,隆庆初,李侯绍先迁治城,因寺址与公廨对峙,复迁城外西南。”此寺沿革相当清楚。

④ 朝鲜正祖设置舟桥司,定舟桥之制,并亲撰《舟桥指南》一书,也于正祖十四年(1790)十二月,在汉江用80只船造舟桥一座,以为水原园幸之用。见《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太白山史库本),卷31,页55a、60b。以后数年又不断研究浮桥技术,同书卷37,页3a-4b,正祖十七年(1793)春正月十一日条,又有:“舟桥司进《舟桥节目》”,内中谈造桥技术甚详。



图 137 故城县与梁家庄之间古有驿路、今有浮桥

水-35《德州》(图 138)

《嘉靖德州志》云：

德州城，洪武三十年都督张文杰、指挥徐福招、基累禱修之，周围一千九百五十六丈许，计一十里零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七尺，池深一丈，阔十五丈。有五门，东曰长乐，南曰朝阳，正西曰定边，偏西曰广川，北曰拱极，其城东、北隅各有楼以贮兵器。弘治九年守备胡翰建城楼四座，以壮威望。^①



图 138 《水程图》之《德州》

四门所通驿路不同，东门通德平、陵县路，南门通恩县平原路，西门通衡水故城路，西北门通景州路，北门通景州吴桥路。

^① 见[明]郑瀛修、何洪纂《嘉靖德州志》(明嘉靖七年刻本)，卷1，页29b-30a。

张复的下一站梁店水驿在吴桥县,本应出北门,但因为北门是陆路,所以他的运河船是从西北门外经过,换言之,这幅图画中的城门,就是西北门广川门。

笔者将张复的原图也数字化之后,置入已经叠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测绘的《山东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德州及北厂幅的卫星地图(图 139)。将张复图中的西北门口与二万五千分之一图中城墙一线的西北门(广川门)重合,经过比例微调之后,可以看到张复所绘与实际的大部分南运河河道相符,他所画的广川门外朝南的道路也与二万五千分之一图非常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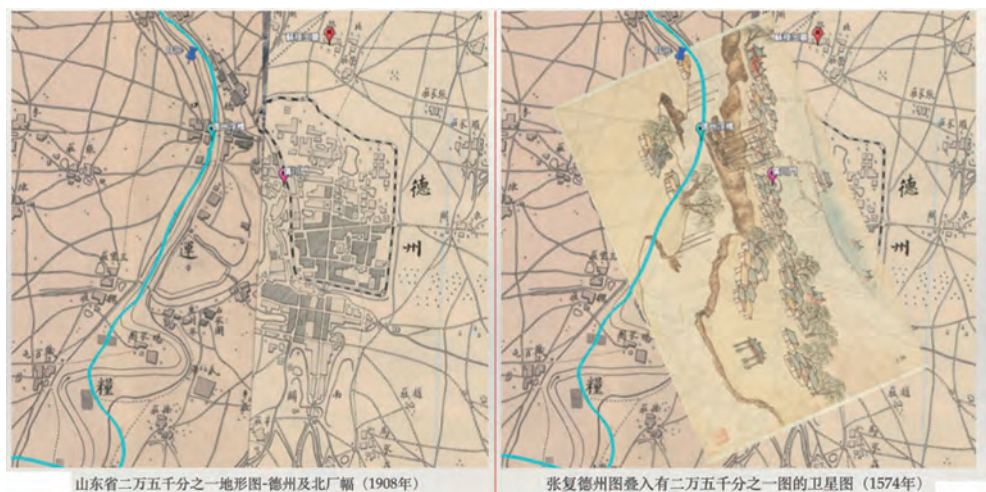


图 139 《山东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之德州城与张复画作之叠图

回到张复的图来,图中左上角的祠庙,应是苏禄王墓,位于北营村。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来朝,回国时病逝于德州驿馆,赐葬于此处,明清至今,皆为景点。稍往南,运河中停泊众多船艘处应是安德水驿,《嘉靖德州志》云:

安德水驿,在西门外迤北。嘉靖三年重修,扁曰驻节。安德马驿在南门外迤西,嘉靖三年重修。^①
《嘉靖德州志》并言安德水、马驿,乃不同位置。安德水驿在西门外。按,西门在西北门之南,相去不远,今既言西门外迤北,何不直言西北门?张复图中众船合泊处,隐隐只可望见广川门洞,所谓“西门外迤北”应即此。图 140 是今人所设置之安德水驿景点,位于德州城南之南关西之运河边,依《嘉靖德州志》,此处应是安德马驿,非水驿,不过明代设置时也未言安德马驿在运河边。

令人不解的是张复图的中央,应有运河上著名的广川浮桥,《乾隆德州志》云:

运河浮桥,在广川门南,名曰广川桥。洪武三十年修,至万历四十年改河,筑回龙,浮桥西移。旧系东西,改为南北。雍正十二年又改河,移至小西关,桥又东西。其废河中设浮桥处,筑堤而路。^②
又王初桐《北游日记》云:

二十四日[五月二十四日,1774/7/2,2369183],过德州桥,即浮桥也。王元美诗:春风绿遍德州桥。《德州志》又名广川桥。^③

① 见《嘉靖德州志》,卷 2,页 10a。

② 见《乾隆德州志》,卷 5,页 24a。

③ 见[清]王初桐撰《北游日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收入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 30 册),页 651。

又据《乾隆德州志》，此处明代建有四牌坊：

一曰东连齐鲁，二曰西通漕运，三曰南接藩省，四曰北拱京畿。^①

这些题字分明就是驿路的用语，因此，浮桥必然在这里，可是，我们看到了图中的牌坊，却没有看见应有的浮桥。浮桥是重要的设施，可以同时渡车马与行人。^② 这条浮桥是德州通往景州的驿路，明高懋功《云中纪程》云：

十一日（五月十一日，1712/6/14，2346520），行三十里过恩县，……三十里，至苦水铺，……又四十里，至德州郭外，过浮桥，桥下运河卫水所经之地。……又二十里，至刘智庙，山东之路止于此。出旅店北行，则北直河间之景州，往京师大道。^③



图 140 今人所设置之安德水驿景点 (37°26'49.14"N, 116° 16'8.298"E)

也许张复的船只经过时，浮桥临时拆除，如顾廷纶《北征日记》的例子：“七月间来时，秋水甚旺，浮桥尽撤，故车马皆用船载渡。^④ 但这时候才农历二月底，不是水量的高峰期，浮桥不应收起。回顾前面《临清》图（图 127），鳌头矶前本有浮桥，但张复也没有画出，不可理解，只好存疑。

水-36《梁店驿》（图 141）

《梁店驿》幅，图本身没有错误，收藏家（也就是图册排列者）把它误认为梁家乡闸，因而错置到东昌府与临清州之间。梁家乡闸，又名梁乡闸，位于 36°36'1.67"N、115°54'26.78"E，南距东昌府 25.303 公里，北距临清

① 见《乾隆德州志》，卷 5，页 28b。

② [明]王穉登《客越志》，页 17b。王穉登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曾对明代水利设施的名称作过解释。他是明州人，以家乡为例，曾说：“明州海滨泽国，乱流争趋，其治水之法，因形创制，纷纷别名，凿而渚之曰陂，疏而导之曰渠，障而高之曰堰，堤而石之曰堰，枢而运舟曰坝，以时停决曰闸，方舟连络，车徒并济曰浮桥。”

③ 见[清]高懋功撰《云中纪程》（台北：广文书局，1962，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六帙第三册），页 4a。

④ 见[清]顾廷纶撰《北征日记》，页 27a-b。

州 43.568 公里。但梁家乡闸是“闸”而不是“驿”，“梁乡”也不是“梁店”，今径予改正。

梁店驿，又名良店驿，又称良店水驿，在德州安德水驿北，水程七十里。《乾隆德州志》说“今坐落柘园镇”，柘园镇另名“桑园镇”。^① 梁店驿之名，早见于明正统四年（1439）杨士奇《南归纪行录》：

五月初四日〔1439/6/15,2246818〕，朝食过德州安德驿，问驿夫新麦，……亭午过梁店驿，驿丞旧翰林院办事吏，极言久旱颗麦无收，……。晚过连窝驿，甚早无麦。是日晴。^②

张复这幅图很简单，在南运河上画了大量停泊的船艘，显示这里就是驿站，然后又画了具体形象的驿楼。我们前边看过的几个驿楼，下面门洞都是圆形的，这里换成方形，楼也比较高大。

至于物体的方位，张复做了大幅度旋转。梁店驿本来在运河东岸，依照一般地图南下北上的习惯，应在画面的右部，张复把它旋转到图的上部。图 142 把卫星图做了 80 多度的旋转，请在相同角度下对比。

比较过两幅图之后，将会发现南运河的折曲形状，古今十分相似，特别是最下端突出的弧形部分。张复所绘梁店驿坐落的位置，并不在弧形的中央，而是略为偏左，笔者也依他的条件，为梁店驿作了 GPS 定位。有趣的是，张复画中梁店驿的位置，恰恰是清光绪时期二万两千分之一地形图所画的南北向街道的末端，现在这条街道拓宽了，称为长江路（图 143），也是吴桥县桑园镇的中心道路。



图 141 《水程图》之《梁店驿》

① 见《乾隆德州志》，卷 5，页 30b。

② 见《东里集》续编，卷 50，《南归纪行录下》，页 19a。此为北上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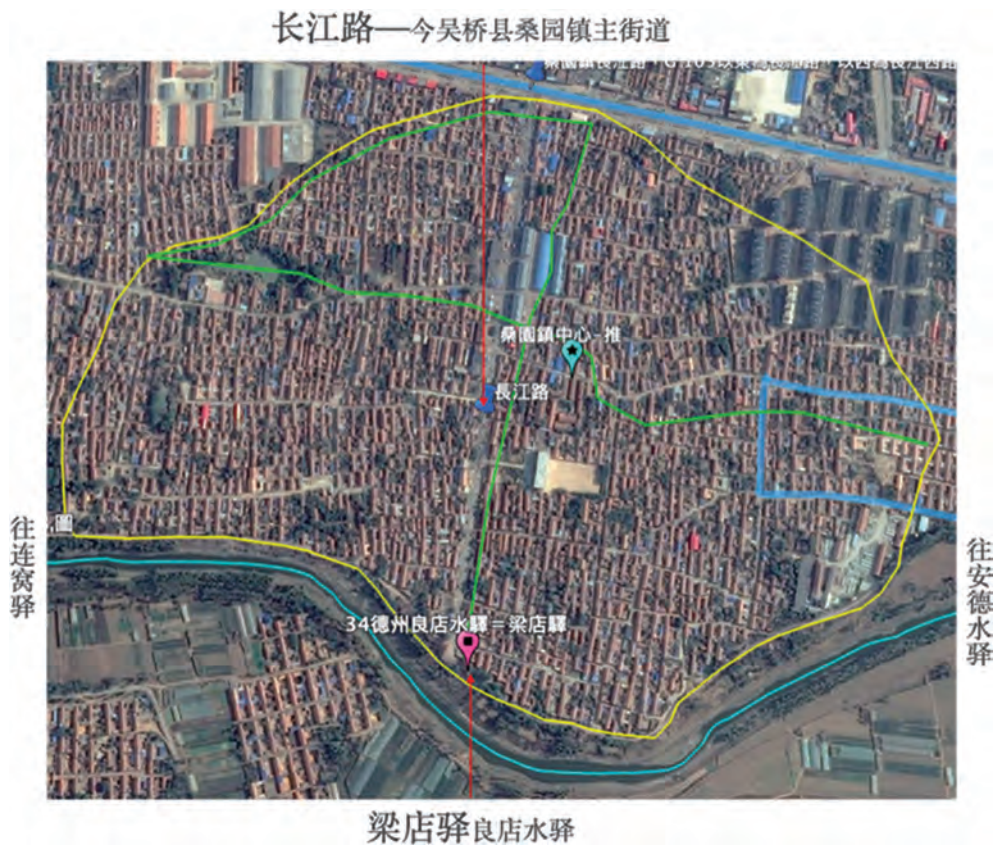


图 142 卫星地图上之梁店驛河形



图 143 长江路底运河今貌,梁店驛在此

水-37《连窝驛》(图 144)

本图的主体是连窝驛,张复在驛楼旁亲自标记了地名。这座驛楼的模样与梁店驛极相似,仅驛前多了一道影壁,为他处所无。图的左部有一座大庙,连窝驛所在处火神庙最大,位在吴桥县的北界^①,应即此。图的右

^① 见《光绪吴桥县志》,卷1,河渠,页1a:“运河,……东岸,自山东德州半截碑对岸交界起,北至连镇火神庙东光界止,计河程六十五里三分,系吴邑管辖。”火神庙在吴桥县最北,与东光县为界。

部有墩楼二、墩台二,《明实录》正德六年六月十六日条云:

贼杨虎等复自山西十八盘山口还破武安县,燬临洺镇,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县,及景州东西关、连窝、泊头等镇,由淮镇店渡河,复入文安,与刘六等合。时都指挥桑玉达官、指挥冯安,屡为所败,兵备佥事许承芳请教兵,命署都督同知张俊充副总兵,都指挥使王琮充参将,率京营兵千人往讨之,仍令山东、河南、直隶守臣,分布防御。^①



图 144 《水程图》之《连窝驿》

至于图中的山,又是虚构的。作者大概想画泰山,因为从南运河隔岸向梁店驿后方眺望,数百公里也不会有山岭,只有向图右上角那个方向去找,才能看到唯一的山,就是泰山。但是,泰山南天门距此 165.31 公里,当然也是看不到的。我们很难理解张复的心,为什么他把当前河岸曲折的细微处理得如此精确,对于,又莫名所以地添注那么明明看不见的山呢?笔者怀疑这些身份不明的山形,是王世贞将张复的原作送给他的老师钱穀润色时,钱穀未到过北方,画蛇添足而不自觉。

刘六、刘七是河北霸州人,起兵时声势盛大,一度传说将围北京。当时政府既然“令山东、河南、直隶守臣,分布防御”,图中的军事设施便应是为,张复以写实之笔留下影像,弥足珍贵。

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张复作画有一个习惯,就是满帆行驶的船只都是和他们的前进方向一致,亦即向北京而行,而且图中的火神庙也位于最北端,据此,画在上半部的便是运河东岸。换言之,张复在运河东岸画了连窝驿与大量民居,对岸则寥落点缀而已,与《河北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景县》幅的民居市廛相同。依此,连窝驿应定位于运河东岸。

但是,《万历河间府志》却说:“连窝驿,在(吴桥)县东五十瑞安陵乡,卫河西南。”《光绪吴桥县志》也说:

^① 见《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76,正德六年六月十六日条,页 1670。

“在县治西北四十里连窝镇，运河西岸。”^①安陵乡在吴桥县北部，明代连窝驿属于安陵乡；清代连窝镇从安陵乡分出，更名为连镇镇，属东光县。由于连窝驿所在运河之河东及河西岸皆隶属吴桥县，若依府、县各志，则连窝驿应定位于运河西岸。像这样，当文献与目击者的说法正面冲突时，只好两存。

或有没有可能，当张复经过时，驿站在运河东岸，其后移于西岸呢？这个问题留待将来有新证据再说。

水-38《新桥驿》(图 145)



图 145 《水程图》之《新桥驿》

本幅原置于《砖河驿》之后，系排列错误。新桥驿属交河县，俗称泊头，现在泊头改制为市，交河县改交河镇，反隶属于泊头市。卫河自南而北，应先到交河县新桥驿，次沧州砖河驿，次沧州长芦，今径予改正。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对于新桥驿引录了三段数据：

南皮县新桥驿，在交河县东五十里。明洪武二十五年五月置，俗曰泊头驿，极冲。（《大清一统志》《旧通志》）

泊头镇在交河县东，卫河西岸，商贾臻集，筑城于此，置新桥驿。（《方輿纪要》）

新桥驿本属交河，乾隆十九年改归南皮县管。（《河间府志》）^②

其中重点在“交河县东，卫河西岸”八字，今据此将张复图的上部，即图中的泊头主要市廛及驿站所在地作为西岸。因此，图右部为北，通砖河水驿；图左部为南，通连窝水驿。方位处理与前一幅《连窝驿》相反，请注意。

回到张复图上，图的左部，有一所大寺，应是金博寺，明佚名《重修金博寺碑记》云：

泊头镇距县治西十八里，水陆要冲，沧瀛一都会也。旧有金博梵宇，不知创于何代，岁久倾颓，僧人福金力任修葺之，白于邑侯李公，公曰可。盖以播绅往来无所憩息，梵宇内旧有官廡，饰此以为驻

① 见〔明〕韩晟修、陈士彦纂《万历河间府志》（明万历刻本），卷3，页13a；〔清〕黄宅中修、冯庆杨纂《光绪吴桥县志》（清光绪元年刊本），卷4，页5b。《光绪吴桥县志》是继承《康熙吴桥县志》而来的。

② 见〔清〕沈家本、荣铨修、徐宗亮、蔡启盛纂《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卷36，页61a-b。

节之地。于是拓其旧址而扩大之,鳩工于庚午岁,落成次年之秋。^①

明朝有五个庚午年,有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景泰元年庚午(1450)、正德五年庚午(1510)、隆庆四年庚午(1570)、崇祯三年庚午(1630),查考上述五个庚午前后曾任交河县的李姓知县,只有正德五年有李镗与李天叙二位是可能人选。第一位李镗,于正德三年已经到任;^②第二位李天叙,是正德八年及十一年见于记载。^③以任期来说,两人只是一前一后而已。由此言之,金博寺的重建可能是二李其中一人担任县令时,而重建的时间应是正德五年或六年,落成于刘六、刘七之乱以前。

今观图中建筑颇新,格局宏扩,式样似有客馆规模,与《重修金博寺碑记》所言“盖以搢绅往来无所憩息,梵宇内旧有官廨,饰此以为驻节之地”相合,此建筑应为金博寺无疑。

今日泊头市发展迅速,运河两岸皆为市区;张复图中虽然以运河西岸的描画为主,但他也在运河东岸画了许多房舍,数量虽不及西岸,也可见东城区的发展自明代已开始。

此外,关于南运河的水情,张复所绘图中并未显示南运河缺水的情形,但笔者于2016年7月17日至19日考察时,南运河的河道多已断流。从连窝驿北的大龙湾桥下(37°51'49.49"N,116°28'3.19"E)起,北到三姓庄桥下(38°10'14.45"N,116°43'44.09"E),经砖河驿、沧州城,至兴济镇北的北排河前,沿路所见南运河河道,有时寸水全无,有时仅留余滩,以河底草色看来,应久已断流(图146)。记此以备参考。



图146 泊头南霞口镇运河桥下的卫河(37°58'20.59"N,116°33'17.21"E),断流已久

水-39《砖河驿》(图147)

本幅主体是砖河驿,《乾隆沧州志》云:“砖河驿在州南十八里,卫河东岸,极冲,现存。”^④图中的驿舍形象与前几幅相同。图中有两座寺庙,一所较小,疑为慧光寺。^⑤左侧的较大,而且在卫河西岸,可能是禅广寺,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禅广寺,在砖河西岸,明正德七年建。(州志稿)”^⑥,应即此。

驿旁河道位于图右部,被画成较深的折曲,现在砖河镇南侧的卫河河道,也有较大的折曲,古今的河流特征相似。图148是笔者将张复图在卫星地图上做叠图,请比较。

① 见《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25,页43b。

② 见高步青修、苗毓芳纂《民国交河县志》(民国五年刊本),卷1,页9b:“县署,……正德戊辰知县李镗增修。”

③ 据《民国交河县志》所载《重修金博寺碑记》,此位李姓县尹,于正德五年鳩工至正德六年落成皆在任。同书又载县令李天叙增修城池,两见于正德八年、十一年,见卷10,页14a:“正德八年知县李天叙增修城池。”又,卷1,页9a:“交河城,……正德丙子十一年知县李天叙增修。”同页,又云:“隆庆三年知县庞沱重修垛口,易土以砖”。

④ 见〔清〕丁廷榘修、庄日荣等纂修《乾隆沧州志》(清乾隆八年刊本),卷2,页8b。

⑤ 见《乾隆沧州志》,卷4,页11a。

⑥ 见《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25,页36a。

水-40《沧州》(图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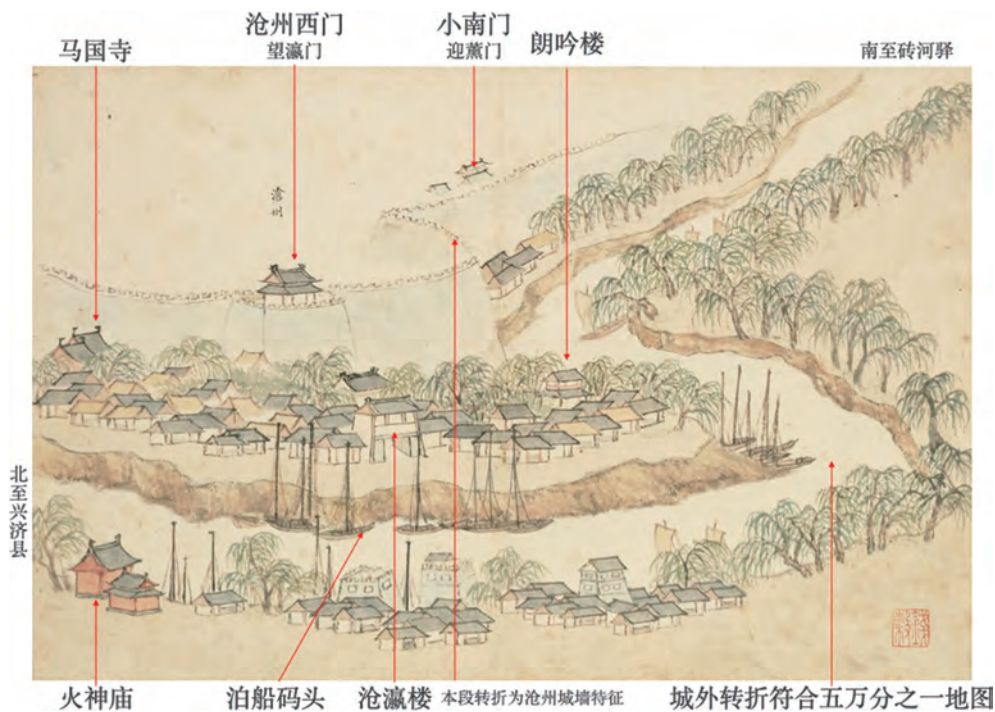


图 149 《水程图》之《沧州》

沧州与长芦县本来是两地,沧州城滨海,而长芦县居运河溪,相距四十里。其后州治移于长芦县,本图所画的乃是移治后的沧州城,所以习惯上也称长芦。沧州城是南运河上的大城,明李若讷《使还畿辅诸河行记》云:

次日[八月十四日,1618/10/2,2312297],行抵沧州,泊宿。……起眺郡城,郁然壮丽,廛市喧集,更饶鱼虾蒲苇之属,解钱易之,以佐柁楼炊秬焉。^①

张复此幅也充分展示了沧州城的壮丽。

张复图中央有楼,建筑类似驿楼,但不是驿楼,而是沧瀛楼。沧州所属的驿站是前一幅的砖河水驿,所以沧州城并无驿站,崔溥《漂海录》经过时,停泊在长芦递运所前:

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一日,1488/5/2,2264671],……又过王家圈口、罗家圈口、红披口、南关等铺,长芦巡检司、盐运司、递运所,踵武科门,到沧州拔夫厂。州城临河之东岸,即汉之渤海郡。河边有望竿,上悬人头以示众。傅荣谓臣曰:彼乃强盗首也。汉之龚遂以单车入此地,平群盗,有卖剑买牛之说。此地盗多劫杀人,自昔犹然。又过联芳、应奎、司谏等门,至泊长芦递运所前。^②

护送崔溥一行的船队先经过沧州南门外的南关,看到悬挂的强盗人头,所谓枭首示众,然后继续开船,停泊在长芦递运所前。文中所说的“武科门”“联芳、应奎、司谏等门”都是岸上的牌坊,属于科甲坊的性质。“武科”是赠贺某位武进士而立,“联芳、应奎”是赠贺某位进士或举人而立,“司谏”应是为赠贺某位封司谏者而立,坊表众多,可见文明发达,市廛热闹,由此看来,长芦递运所位于西门外繁盛之区。

① 见[明]李若讷撰《四品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收入《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0册),卷6,页30a-36b。

② 见《锦南集》,卷4,页50a。

不过,确有不少船艘停泊在沧瀛楼前,如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日本策彦周良使舟第一次入京时,经过沧州,便泊舟于沧瀛楼前:

十五日〔二月十五日,1540/3/23,2283625〕,……酉刻,泊于沧州沧瀛楼前,又此所曰长芦。

十六日,挽夫未打,故开船迟滞。晚炊后,同大光、钓云上岸,散步于人里。有楼门,揭望瀛二大字。又游敕赐集善禅寺,有楼门,按四天王像,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又其次,东有土地堂,西有祖师堂。佛殿三世如来,左右有十六罗汉大像。后门中央有观音乘卧,其邻左文殊骑卧师子,右普贤骑卧象,岩窟如云。又帘铭有菊花高酒四字。^①

挽夫未打,谓纤夫未集。有楼门揭“望瀛”二大字,与西城门名称相同,应指西门。策彦于同年五月回程南下时,复经沧州,仍泊于沧瀛楼前:

廿七日〔五月二十七日,1540/7/1,2283725〕,天晴。卯刻,开船。夜来梦祝英尊君。午时。到沧州沧瀛楼,下岸而泊矣,舟行四十里。盖此处非驿,挽夫于是打了,故寓于此。^②

来程时说“挽夫未打,回程时说“挽夫于是打了”,皆指长芦递运所自拨夫厂替他们补充了纤夫。“沧瀛楼”的名称,在清代刊行之《沧州志》和《天津府志》中都查不到,是因为在清代已改名为“望瀛楼”,也或许是受到西门望瀛门的影响,才把此楼的名字也改变了。但是明代一直称为“沧瀛楼”,与策彦周良相隔数年后登上此楼的邱云霄和靳学颜,也都使用“沧瀛楼”名称。

邱云霄是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自福建取铅山路,东下杭州,经大运河北入燕京时,五月三日(1546/5/31,2285885)泊舟沧瀛楼下,登楼题《登沧瀛楼》诗而去:

扁舟去且住,长帆尚残曛。揽衣盼徘徊,澄抱谢嚣纷。微风吹白波,落日生红云。悠然望故都,况乃怀明君。断霞递飞鸿,寒光乱沧雯。慷慨激危歌,余响生氛氲。白首犹束书,青萍空绿文。新月满东楼,孤音谁为闻。^③

靳学颜是在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吏部左侍郎谢病告归得允^④,于次年六月末离京,经由沧州,所作《得告后纪行六首》的第二首即泊沧州之作,诗云:

南下指齐鲁,水云不可求。燕赵名悲风,千里吹寒流。挂席迅六马,游子心不休。讯涂亡昏晓,指景历林丘。水宿露气重,时或戒重裘。九河未及访,且登沧瀛楼。^⑤

《得告后纪行六首》使用顶针的连章方式,第二首结束于“且登沧瀛楼”,第三首即接着:“登楼见海水,群山荡灵泡。愿采赤水叶,何由鞭六鳌”开头,可见他已登楼观览。不过,像这种诗句只是大言欺人,实际是看不到海水的,因为从沧州城到渤海湾直线距离约70公里,即使在城上的东门也望不见大海,更何况沧瀛楼在西门外,视线为西门城墙所遮,更加没有可能。当然,明朝人以这种笔法写诗很常见,他自己觉得诗兴遄飞就好了。登楼结束之后,靳学颜就唱着:“夷犹未能舍,我舟已鸣橈”,发船而去,他是济宁人,经由卫河,日夜不息,很快在七月初就回到故里了。

从上述多重例证可知,这座沧州的名楼就是“沧瀛楼”,张复来到此楼的时间,只比靳学颜晚了三四年,名

①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77,总页232。

②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90,总页245。

③ 见〔明〕邱云霄撰《北观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7册),卷3,页1a。

④ 《明实录·穆宗实录》,卷51,页1288,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云:“辛卯,吏部左侍郎靳学颜以病乞归,许之。”

⑤ 见〔明〕靳学颜撰《靳两城先生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2册),卷4,页18b-20a。

称还未变。

长芦递运所和策彦周良沧瀛楼,虽然一个是公署,一个是名楼,性质并不相同,其位置应该是相邻的。因为他们都提到了挽夫,崔溥说这里有“沧州拨夫厂”,策彦说“盖此处非驿,挽夫于是打了,故寓于此。”所谓“于是打了”,就是“在这里找齐挽夫”的意思,“这里”就是指“拨夫厂”,它的位置就在沧瀛楼北面不远处。^①此外,笔者还标了朗吟楼、火神庙、马国寺,皆载于方志。

回到张复的图面上,正面就是气势宏伟的沧州城墙,当中一门正是西门,又称望瀛门;东边还有一个城楼,那是小南门的城楼,又称迎熏门。怎么判断这是小南门呢?沧州城墙的结构十分特殊,在西南角有一个明显的直角大转弯,张复的图中也画出了城墙转弯的造型,沧州儒学就在城墙的大转弯之中,《乾隆沧州志》的《儒学》项下说:

明初州判纪惟仁择城外大南门西、小南门东幞头之处,申请建立学宫。^②

这座儒学明清时历次在原地重建、维修,现在以沧州文庙为名,成为知名古迹(图 150)。兹以现存大成殿古迹为代表地址(38°18'25.02"N,116°51'7.31"E),利用这条线索,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大小南门。根据上述特征,就可以知道该城门是小南门了。请看《乾隆沧州志》中的《州城图》(图 151)。



图 150 沧州儒学(文庙)之明伦堂

① 拨夫厂的位置,可以计算得出。据《乾隆沧州志》卷2,页8a:“批验所大使署,在西门外,拨夫厂北首,临运河。”在《州城图》中画有“批验所”和“望瀛楼”,拨夫厂就在中间。

② 拨夫厂的位置,可以计算得出。据《乾隆沧州志》卷2,页8a:“批验所大使署,在西门外,拨夫厂北首,临运河。”在《州城图》中画有“批验所”和“望瀛楼”,拨夫厂就在中间。

驿楼后面的兴济县城,据《嘉靖兴宁县志》说只是土城,竣工于嘉靖三十年(1551)六月三十日:

土城,周回几三里一丈八尺,底阔一丈五尺,顶阔九尺。东西门楼两座,扁东曰海晏门,西曰河清门,因东望海,西邻河故名之,寓祝愿也。角楼四座,敌台六座。嘉靖三十年知县萧落协、主簿张好仁、典史李实创筑,始事于三月二十五日,竣于六月三十日,池宽一丈,深八尺。^①

对照张复的画面与县志的文章,笔者觉得张复所画的城墙大小规模未免失实。

图上偏左处,有一座高建筑,应是“龙窝”。龙窝,是明弘治皇后的生家,《万历河间府志》云:

龙窝,在县城外,临河。明昭圣皇后诞毓处,弘治中敕建宫于梓里,御制匾额曰:“龙窝”。^②

文中“弘治中敕建宫于梓里”,就是弘治十一年(1498)四月十二日兴建,十二年(1499)五月十九日完工的“崇真宫”。这所道观除了纪念弘治皇后外,也奉祀真武帝君,因而被称为真武庙。日本策彦周良于嘉靖十九年(1540)和嘉靖二十八年(1549)两度使行北京的途中,来回都去访问了这个地点:

[北上时]廿六日[五月二十六日,1540/6/30,2283724],……未刻,着乾宁驿。驿门横揭乾宁驿三大字,舟行七十里。……酉刻,同即休、三英上岸到道士观,观门竖揭阐威门三大字,入此门则左右有钟、鼓之二楼。又有碑亭,有殿,揭三清殿三大字。中央安老子像,像前揭承恩二大字。又东西廊庑小殿者多多,安诸星斗之像。殿里壁间丹青可睹,殿檐逐一揭额,有咸通殿三大字。^③

[南归时]二日[四月初二日,1549/4/28,2286948],立夏,辰刻,开船,着乾宁驿。正午,同钧云、江云上岸游敕建三官庙,正殿竖颜三清殿三大字,周回之堞琉璃色,中有三殿共琉璃瓦。两庑壁间之彩画,颇极丽美,盖此所弘治天子皇后之乡里也,以故立此道士观,有石碑,弘治十四年[1501]立云云。^④

策彦周良特别描写的“三清殿”,是崇真宫的主要建筑三殿中的前殿,另两殿是中殿灵应殿和后殿普济殿;“咸通殿”是两庑偏殿六殿之一,六偏殿,左为普惠、昭灵、迎晖,右为显象、广济、咸通。至于策彦所说“观门竖揭阐威门三大字”者,应该就是图中高大的门楼建筑。策彦此记,写于嘉靖二十八(1549年),张复过此作画时为万历二年(1574),相去不过二十五年而已。

水-42《清县》(图 153)

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六年后,张复过此,旧县治的房舍还巍然立在运河岸边,就收入图画中。其实,即使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若讷经过青县,也还说:

行过青县,县城傍岸,居民亦盛。^⑤

清县即青县,北宋、金、元皆为清州,明代改称青县,因而明清诗文中经常混用二名。

南运河自德州往北至兴济县,都流经州县城之西,到了青县,却从县城东流过,因此,张复此幅,主要的建筑物都放在图的上部,是把东西位置做了互调,也就是说,图的上部为西,图的下部为东;右部为北,左部为南,和一般习惯相反,读者请注意。至于帆船行进的方向,仍然向北,保持着北行入京的路线。

由于青县的县城没有设驿,所以规模最大的主建筑是县治,《康熙青县志》云:

县治旧在卫河西岸,去城一里。洪武间知州李敬建。后改州为县,隆庆戊辰[二年,1568]知县李镐移建城内,今仍之。^⑥

① 见[明]萧蕃修、郑孝纂《嘉靖兴宁县志》(民国钞本),卷上,页10a-10b。

② 见[明]韩晟修、陈士彦纂《万历河间府志》(明万历刻本),卷2,页40b。

③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90,总页245。

④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再渡集》,卷下,页39,总页363。

⑤ 见《四品稿》卷6,《使还畿辅诸河行记》,页30a-36b。经过青县是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1618/10/1,2312296)。

⑥ 见[清]魏瀛修、刘炳纂《康熙青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卷1,页7a-7b。

依照文中的说法,旧县治本来在卫河西岸,去城一里。要了解所谓“去城一里”,就必须知道青县县城的特殊结构。青县原来没有筑城,人民市廛都傍岸而居,县治、儒学也都在河边,从船上就可以看见。以后,才在距离运河岸以西约八九百米处建立了新城,新城建好,县治当然也迁入了,这就是引文中说的“隆庆戊辰知县李镐移建城内”。



图 153 《水程图》之《清县》

县城傍岸,还是老县治,不是新县治。新建的青县城很小,约仅 3836 平方米,又远在八九百米外,隔在闹市背后,不注意就不会看见。笔者认为李若讷并没看见新城,所以,他所说的县城仍是运河沿岸的市区。

旧县治之外,笔者在图上标了几个代表性的建筑,首先是钟鼓楼。普通较有规模的府县城,府治或县治的正前门或左前方,会设置谯楼,或称鼓楼,而图中这个小小的亭子,就是青县旧治的钟鼓楼,见崔溥《漂海录》:

至芦台旧城,城北接青县之治,俱在河之西北岸。县前通真、保定、滹沱三河所会,故谓之三汊。

又过钟楼阁、社稷坛、峭帆亭、中州集,至河间府地方。^①

“滹沱”,就是滹沱河;“通真、保定、滹沱三河所会,故谓之三汊”,是指从山西流入河北的这些河流在青县的青口注入南运河,明朝人很多相信此说法。“县前”,就是指县治前。接下来四个小地名“钟楼阁、社稷坛、峭帆亭、中州集”连续排列,意指钟楼阁最接近县治,依次渐远,但其实都相距不远,峭帆亭是青州八景之一,就在眼前而已。

其次是旧县治前的两座建筑,笔者将临江的这一座指定为儒学,把儒学后面的这一座指定为城隍庙,是依据《康熙青县志》所云:

儒学,……洪武四年知州李敬移建于城外,永乐三年知县曹继、成化十一年知县苏俊俱重修,弘治十四年知县周忠更修堂斋厅宇若干楹,万历十三年因逼近卫河,知县王思贤移建于学西。

^① 见《锦南集》,卷 4,页 52a-52b。

城隍庙,在文庙后。^①

可见在万历十三年(1585)之前,儒学是逼近卫河的,而城隍庙又在其后。不过,还是得提出一个疑虑。

因为青县的驿站在流河镇而不在县前,所以,我们可以不考虑图中的房舍是不是驿站的问题。但是在这所被指为文庙的建筑,与砖河驿(图 147)的造型结构太相似了,实在很可疑。

至于县名应如张复所标之“清县”,还是应该写成“青县”呢?当然,青县才是正名,但是明朝人写成“清县”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正德七年(1512)陆深《淮封日记》^②、万历九年(1581)顾绍芳《南还日记》^③,所以,也不能说张复这样写不对。

水-43《流河驿》(图 154)



图 154 《水程图》之《流河驿》

本幅比较简略,除了主题“流河驿”之外,还有若干烟墩,夹河警戒。虽然也画了许多公私房舍,但都没有放在重要的位置,因而笔者也不为之定位。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流河镇的主镇区是在运河西岸,图中也显示了西岸的建筑物相对较为精彩,但全图压得很低,似乎不愿将它呈露。

第二,前一幅《清县》与本幅主要城区都在运河西岸,但青县在处理时做了方位变更,本幅则未做改变。

第三,驿前三艘船的桅顶上挂着信号旗,初看像是桅顶悬挂的测风信号旗,细看乃是军旗。

第四,超过一半的画面用来淡扫远山,其实,这些山是绝对不存在的。

最近几幅,张复都添加了远山,甚不可解,如前文所言,笔者推测是钱穀润色时所加。

① 见《康熙青县志》,卷1,页8a;卷2,页1a。

② 见《俨山外集》,卷8,页1。

③ 见《宝庵集》,卷16,页9a。

水-44《杨柳青》(图 155)



图 155 《水程图》之《杨柳青》

笔者发现,进入南运河以来,张复相当留意河岸,所画的河岸曲折,往往与现在的地形地貌相近似,这幅《杨柳青》也是一样。

笔者将这幅图数字化之后,在卫星地图上,可看见张复所画的杨柳青水岸的曲折与民国 25 年(1936)印制的《河北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杨柳青》大略吻合。^① 现代虽然大运河修复工程以及杨柳青古镇观光建设对本区街道与河流都做了修改,但与张复所绘的河形也大致吻合。

杨柳青是入京的孔道,有陆路和水路在此分道,因为这个交通条件,既设驿站,也设有递运所,崔溥《漂海录》所记最为清楚:

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三日,1488/5/4,2264673],……至武清县地方,过杨青递运所,人定时,至杨青驿,地名都是杨柳青也。留泊移时,三更复开船而行。二十四日,……晓,过直沽城,河名即沽水也,至天津卫城。^②

驿站与递运所同属于兵部车驾清吏司管下的驿传设施^③,驿站所管的项目,有经营驿舍,提供食宿,如果外食者,口粮也到驿站支领;所需船只、骡马、纤夫、挑夫,本来驿站应该供应,但是,在明人文集里也常见由递运所提供,而且,由所记载协调船只的情形,似乎主要由递运所供应。此外,递运所甚至还提供洗浴。^④ 当驿与递运所同时存在时,据崔溥所记载,两者相对位置有时像河西务,河西驿与递运所相距七八步;有时像界首驿,驿与递运所东西相对;也有类似在淮安,淮阴驿位于城的对岸,递运所与驿相接。

杨青水驿,又称杨柳青驿,原本是设在杨柳青,递运所也同时设有,如永乐十二年(1414)、正统四年(1439)

① 《河北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杨柳青》本身有绘图技术上的瑕疵,但经过数字化处理,仍可利用它来完成场地比较。

② 见《锦南集》,卷 4,页 54a。

③ 见《大明会典》,卷 145,兵部·车驾清吏司·驿传一,页 2017。

④ 见《淮封日记》,卷 8,页 5a:“戊申[六月六日,1512/7/18],晴热,早,抵济宁,解维,暮宿鲁桥,入递运所作浴。”

杨士奇皆曾在杨柳青夜宿此驿:

九月廿四日〔1414/10/7〕,早,微雨。鸡鸣过兴济,早过青县,食后晴,过流河驿,晚过静海县,夜宿杨柳青驿。^①

二月廿二日〔1439/3/7〕,晚过桃花口、引儿湾及丁字沽,夜宿直沽。是日晴。二月廿三日早,发直沽,食后过杨青驿,索递运夫,过午不得。^②

其后,张邦奇《南行记》载其正德六年(1511)经杨青驿:

廿七日甲辰,至天津〔八月二十七日,1511/9/18,2273211〕。廿八日乙巳,予先行,拟泊杨青驿,比至,其土人给曰:是多寇。辄复行,逆风,雷电晦冥,夜漏下四鼓,乃抵泊独流。^③

陆深于正德七年《淮封日记》载其过杨柳青之杨青驿,云:癸巳〔闰五月二十日,1512/7/3〕,微雨。巳,过杨村驿,暮,宿天津。是夕,复小恙。甲午,风雨,卧疾。午后,过杨青驿。暮霏,宿静海县。^④

严嵩于正德十一年(1516)及正德十三年(1518)皆过杨柳青之杨青驿:

七月初五日〔1516/8/2,2274991〕,五鼓,行,过杨青驿,至天津。(《北上志》)

己酉〔七月十二日,1518/8/17〕,小雨,发天津,二里,过建平亲识范举家饮。晚,晴,至杨青驿宿。

草间多蚊,扑面嚼肤,拂之不去,竟夕目不交睫。四更,时雨,启行,次奉新驿。(《西使志》)^⑤

后来,杨青驿移置到天津,何时所移,年月不详,《大清一统志》追记其事,以为系明嘉靖十九年(1540),似不正确^⑥,因为嘉靖十九年(1540)策彦周良经过时,杨青驿仍在杨柳青也,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

廿日〔五月二十日,1540/6/24,2283718〕,……午时泊于天津雄镇门前,舟行四十里。盖憩船者,候挽夫也。

廿一日,……挽夫未打,故不开船。

廿二日,……未刻,挽夫来,鸣鼓开船,船路二十里而泊于中流,时维酉。丑刻,乘月拔船。

廿三日,辰刻,着杨青驿,舟行二十里。^⑦

文中清楚可见,崔溥从天津雄镇门航行四十里,才到杨青驿,而杨柳青与天津卫恰有四十里。

杨柳青的地位重要,因为它除了是运河水路的重要水驿之外,陆路也有入京的快捷方式,归有光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上京也经由此路,见其《壬戌纪行》:

二月初一日〔1562/3/5,2291642〕,至刘指挥庄,雇肩舆小车,庄人皆来叩头,与曹子见小饮登舟。

初二日,移舟杨柳青,陆行至韩家树,渡滹沱河,风极冽厉,有河冰,待久之乃渡。道会泉南诸友,饭桃花口,宿杨村。明日,行至华黎庄,步观神庙前石刻,……予局踣小舟中,少所见,独记所止处而已。

陆行观此石,字画楷劲,而年号官名皆辽时,故记之。^⑧

这条入京陆路,在杨柳青北渡过子牙河之后,取道韩家树村。比起经由天津卫,出天津北门,从豊道,起西沽,

① 见《东里集》,续集,卷48,《北京纪行录》,页12b。青县,原作莘县,字讹,改。

② 见《东里集》,续集,卷49,《南归纪行录》,页3b。

③ 见〔明〕张邦奇撰《靡悔轩集》(合肥:黄山书社,2013,《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20册),卷2,《南行记》,页6b。

④ 见《俨山外集》,卷6,页7b。

⑤ 见《铃山堂集》,卷27,页8a,9b。

⑥ 见《大清一统志》,卷21,页9a:“杨青水驿在府城外,旧在武清县南一百五十里杨柳青,明嘉靖十九年移置于此。又有杨青马驿亦在府城外,有驿丞掌之兼巡司。”

⑦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89,总页244。

⑧ 见《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6,页7b。

历丁字沽至桃花口这条道路,里程更近。^① 韩家树,今作韩家墅,位于 39°11'31.70"N、117°4'47.85"E,在天津市北辰区。

回到张复的图中,居中的建筑,疑是迁徙前的杨柳青水驿(杨青驿),其一旁较高者,似为文昌阁。^② 运河中帆船,依例应朝向北京,航向下一站天津,也就是说,应该朝向图的右部航行,但本图画成相反方向。

杨柳青运河北岸有陆行的驿路,路旁大量设置军事栅栏,绵延不绝。据《明史》所载,在王世贞此度来京之前,二十年间,京师就曾三度戒严: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丙午,俺答犯大同、宣府。戊午,犯怀来,京师戒严。

[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十月丁卯,辛爱、把都儿破墙子岭入寇,京师戒严,诏诸镇兵入援。^③

[隆庆元年,1567]九月乙卯,俺答寇大同,诏严战守。……乙亥,总兵官李世忠援永平,与敌战于抚宁,京师戒严。^④

杨柳青属于天津府,与顺天府密迩相连,一旦京师戒严,天津府应该都受到戒严命令的约束,架设木栅,就是严加战守之备。张复舟行至此,正好见证了当时紧张的情势。虽然这些栅栏不仅本幅有之,此后各图都有,但像这样大量的立栅,本图是独一无二的,应与杨柳青没有城墙有关。

图中依然画了远山,但是,离杨柳青最近的山,一是位于西北 319 度、距离 137.8 公里的山,高度约海拔 960 米,一是位于西北 330 度、距离 141 公里的山,高度约海拔 617 米,都在北京城的西北,不可能看得见。

水-45《天津 杨青驿》(图 156)

前文谈到杨柳青的杨青驿不知何年迁移到天津卫,文献无征,如果利用张复的《天津》幅,便可证明万历二年(1574)杨青驿已经在天津卫城的城外了。

张复此图对河岸的处理上并不成功,在这个区域有三条河流交会:张复是从南运河(卫河)而来,即将向北运河(白河)而去,另外一条是流经天津东门外入海的海河。依前面各幅图的处理经验,钱穀也好,张复也好,都能够提供良好的河岸线,让我们找到必要位置。然而,本图却不是这样。

首先,是他对南运河的处理完全失控,这条河流在天津城北门外,有大幅度的环曲,而张复却画成直岸;南运河与北运河、海河的交会口,河形也不是画里这个样子;海河又画得异常宽大。其次,是城墙城门与河道的关系,如果画中的主城门是北门,那么往图左过来的这座门应该是东门,但又画得太接近,天津城是端正的长方形,北门与东门之间的城墙是直角,张复则画成直线。由于这些因素,画中的主城门究竟是北门还是东门其实不能从画面判断。幸好《康熙天津卫志》和《光绪天津府志》都指出了驿站位于北门外:

馆驿楼在北门外,上有津门重镇、畿辅要津匾额,乡会宾兴于此。又,馆驿一所,大门、正堂、后堂共九间。^⑤

文中的馆驿楼就是杨青驿。确定了杨青驿在北门外之后,图中所画的一些特殊建筑,便可以利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图 157),一一找出,将它们加以标记。

① 见《大清一统志》,卷 21,页 10a:“杨柳青渡,在静海县北四十五里,东去天津四十余里,即古柳口也。自此渡上韩家树抵京师,较天津差近。”天津入京之南北往来孔道,见同页《海河叠道》下。

② 见《光绪天津府志》,卷 34,页 3a,“文昌阁,一在杨柳青,明代建崇祯七年重建。”

③ 以上二段分见:《明史》,卷 18,《世宗本纪》,页 243、248。

④ 见《明史》,卷 19,《穆宗本纪》,页 254。

⑤ 见[清]薛柱斗纂修、高必大纂《康熙天津卫志》(民国 23 年铅印本),卷 1,页 3b;《光绪天津府志》,卷 24,页 7b。据原注,本段取自旧县志的《见存公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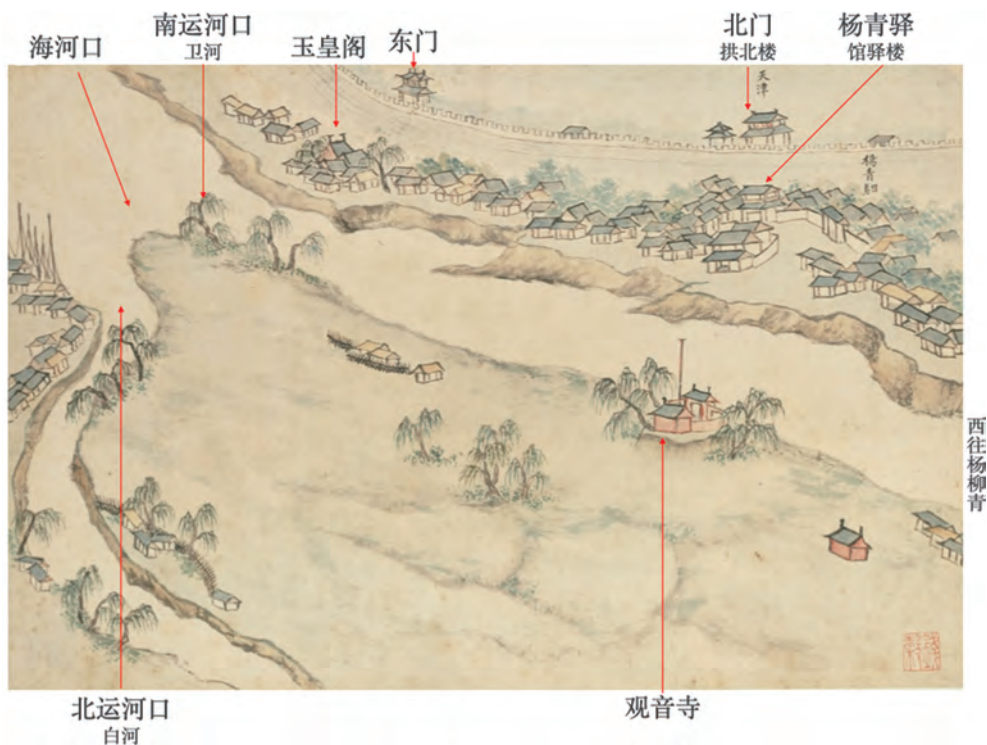


图 156 《水程图》之《天津 杨青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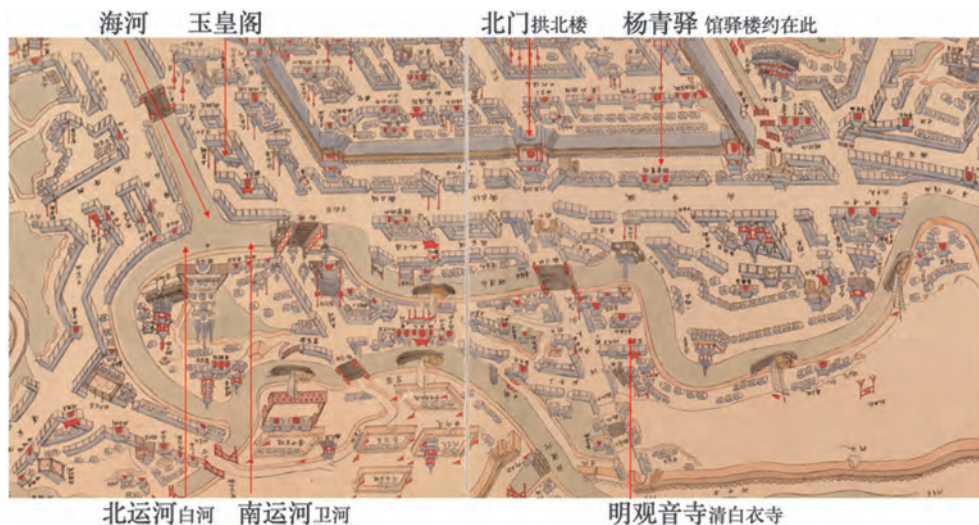


图 157 《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中的天津杨青驿

首先是位于北门与东门之间的玉皇阁,这是今日尚存的著名古迹(图 158)。其次是正对着北门的白衣寺,依《光绪天津府志》所说,此寺在明代称“观音寺”:

白衣寺,在北门外河北岸,明正统七年建,名观音寺。^①

观音寺外,现在是天津市中心的精华区,当年没有什么人家。

^① 见《光绪天津府志》,卷 25,页 5b。



图 158 《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之玉皇阁

4.4 天津至通州——北运河

北运河,又称北河或白河,是天津直沽到通州之间的运程,张复为丁字沽、杨村驿、河西务、和合驿、李二寺、张家湾、通州各画了一幅。

天津是元明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元代伯颜推行漕粮海运,江阴、浙东漕米在直沽登岸。直沽,就是后来的天津。^①

至元二十五年(1288),增立直沽海运米仓。延佑三年(1316),又于直沽设海津镇,祀海神天妃于此,至正九年(1349)立镇抚司于直沽海津镇。^②到了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置天津卫,建天津卫城,隶属于静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设天津直隶州,九年(1731)设天津府。在京杭大运河的时代,天津是南运河与北运河的运输枢纽,到了万历年间,甚至把杨青驿从杨柳青移到天津卫城外。同治、光绪以后,京杭运河逐渐式微,然而,往来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的旅客多由海运,在天津下船,经北运河入京^③,这也使天津与北运河,达到空前繁华。

表7为本段全部的里程,从天津至通州共计148.889公里,第一站天津的累计数为1677.703公里,这是从杭州得胜坝京杭运河起点累加的,如果只计算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从太仓累计,则为1561.103公里。终点通州的累计数为1826.592公里,如果只计算王世贞的私人行程,从太仓累计到天津,则为1709.992公里。

水-46《丁字沽》(图159)

张复《丁字沽》所画的市廛,不可思议地与清末的市街相合。笔者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测图、1905年增补的德国人绘制二万五千分之一《天津市街图》(MAP OF TIEN-TSIN)数字化叠于卫星图(图160),再将张复《丁字沽》数字化上叠,可以清楚地看出河道、市廛都相重合。^④

① 见[明]危素撰《元海运志》,清道光辛卯(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印本,现藏台北“国图”。

② 以上叙述改写自:《元史》,卷15,页311;卷15,页319;卷25,页572;卷27,页629;卷42,页886。

③ 清末北河水陆交通的重要性,可从美军所绘的《北河图》看出,见“Map of the Pei-Ho from above Peking to its mouth, prepared in the War Department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Military Information division, Washington, 1900)。

④ 见《光绪天津府志》,卷34,页7a。

确立了张图与现地的关系之后,我们为天后宫及萧公晏公庙作了标记。天后宫不必说,萧公晏公庙建于明朝,到清朝更名为海神庙。

表 7 天津至通州里程表

序号	图名	里程累计公里数	两站距离	各站 GPS	备注
水-45	天津杨青驿	1677.703	0	39°8'49.11"N,117°10'7.17"E	以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交会为代表
水-46	丁字沽	1685.637	7.934	39°11'1.91"N,117°9'23.08"E	今丁字沽
水-47	杨村驿	1720.727	35.09	39°22'58.82"N,117°3'46.62"E	以邻近武清区政府之运河岸代表
水-48	河西务	1763.416	42.689	39°37'43.30"N,116°57'40.67"E	以张复图河西务城东门位置为代表
水-49	和合驿	1792.572	29.156	39°46'15.28"N,116°52'2.75"E	以今和合站为代表
水-50	湾口李二寺	1811.336	18.764	39°49'48.00"N,116°45'13.17"E	以佑民观牌坊为代表
水-51	张家湾	1816.588	5.252	39°50'53.65"N,116°42'8.59"E	以张家湾南门为代表
水-52	通州	1826.592	10.004	39°54'20.48"N,116°40'40.76"E	以考古公告之潞津水驿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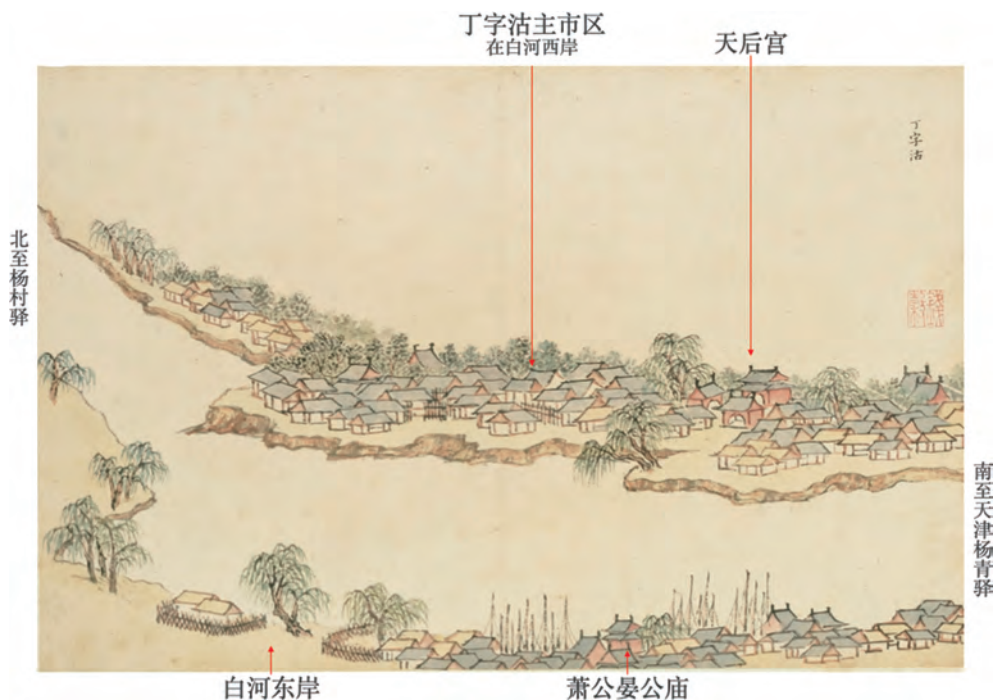


图 159 《水程图》之《丁字沽》



图 160 二万五千分之一《天津市街图》上叠张复《丁字沽图》

水-47《杨村驿》(图 161)

本幅以杨村驿为主体,张复也在驿楼旁加注文字,因此,可以即予确定。



图 161 《水程图》之《杨村驿》

由于杨村驿可确定,驿旁的建筑也可确认为管河通判厅,《乾隆武清县志》云:“管河通判厅一所,在杨村。”^①这所公署与杨村驿的关系,已有明许守思《移建杨村驿公署记》做了记录:

癸巳〔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余视霸道篆,因公走杨村之泚,驻节无所,或藉祠宇,或僦民居,以问邮吏,曰:此地以驿名,驿何在?乃答以:址在判署之南,久废莫或举之,鞠为茂草。心欲别移,而值抱艰西归。无何改岁,甲午〔1592〕顾公襟宇来究兹土至斯,而心余之心也,遂与通判陈君荏、知县汪君鹤龄^②,商经营之事,于旧驿迤北里许,查有邑民程臻等空地一坵,以古驿之址,照数易之,……经始于乙未〔1595〕岁六月,阅月告成。^③

张复在万历二年经过杨村镇,画出了眼前所见的驿楼,十九年后许守思到此时,已经荡然无存。据许守思与驿站人员的对话,才知道原来的驿楼,乃在判署之南,判署,就是管河通判厅。反过来说,判署在旧驿之北。图中这区红砖色的建筑公署,正是位于驿楼之北,由此可以确认,此处即管河通判厅。

水-48《河西务》(图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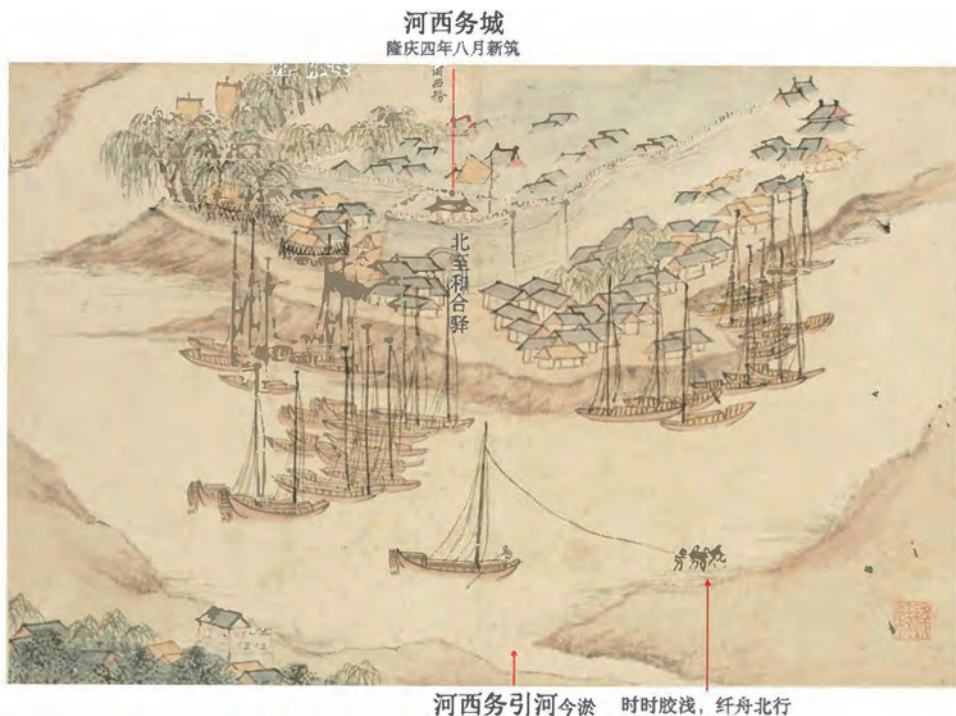


图 162 《水程图》之《河西务》

河西务城是隆庆四年(1570)八月新建的城,见《皇明大政记》《明政统宗》。^④对于张复来说,知名的河西务,全新的关城,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注意力。笔者曾经数字化民国 25 年(1936)测绘的《河北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河西务》,并曾在当地作过现地研究,也在卫星地图上手绘了河西务的城区线。这次再将张复的图本

① 见〔清〕吴翊修、曹涵纂《乾隆武清县志》(清乾隆七年刻本),卷 1,页 15a。

② 见〔清〕蔡寿臻修、钱锡案纂《光绪武清县志》(清光绪七年修钞本),职官表,页 9b:“万历二十二年任汪鹤龄,安徽霍山人,选贡。”

③ 见《乾隆武清县志》,卷 16,页 17b-18a。

④ 见〔明〕《皇明大政记》(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6 册),卷 25,页 89b:“龙庆四年,八月,筑通州河西务城。”“龙庆”即隆庆。又见〔明〕涂山辑《明政统宗》(明万历年刻本),卷 30,页 19b。

数字化,看到张复的所画城形与现地街道明显相符。

河西务的运河河形也与张图相似,例如张复在图底部画有一条小支流,现在这条小支流还在,虽然已经被淤塞,仅仅微存河形;而离此不远,今人又另开了一条小渠,显示这个位置确实有河道的需要。

此外尚须注意者,自天津北上就看不见张帆之船,“时时胶浅”四字正是北河的常见风景。兹以明顾绍芳《北征记》的记录,体验此间真实的航行经验:

十二日〔十月十二日,1584/11/13,2299921〕,竟日行,始抵河西务,杨户部来访,而乡人张卫,慕之英者,故与陆氏外家有连,供事钞关,固为具邀余,重拂其意,以报谒户部后为一过,归舟,街鼓动矣。

十三日,甫解维,而舟人辞风不利,泊岸左久之,行不能里许,而京兆舟所寄载酒米甚伙,坚不肯出舟,又时时胶浅,余物色之良审,乃以先一日督令徙置别船,而所僦船尾余舟而行,仅泊岸食顷,而沙岸善崩,砉然压其舟如建墙,遂沈焉,舟人竞奔赴之,所费货大半败,而余舟亦停至十四日质明始发。^①

水-49《和合驿》(图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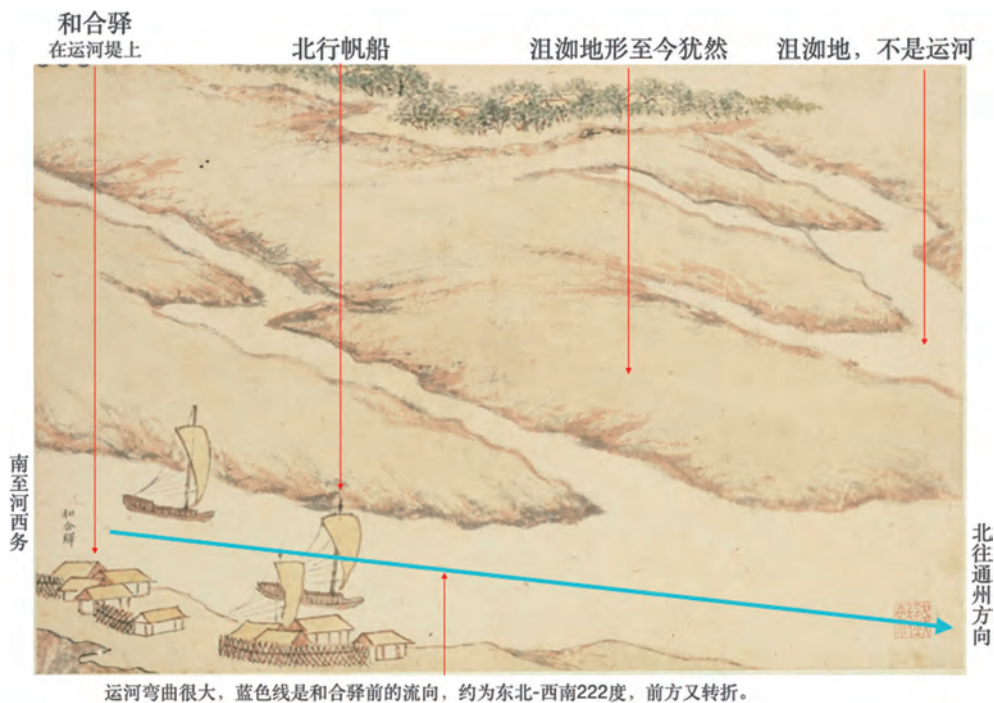


图 163 《水程图》之《和合驿》

《河合驿》主要表现的是河道所在地为水路纵横的沮洳之地。

明杨士奇于永乐十二年(1414)作《北京纪行录》,记录了在这一带沮洳地陆行的经验,颇饶趣味:

九月廿九日〔1414/10/12,2237806〕,晴,早至萧家林。数日来河路屈曲,舟中困卧闷闷。食后,便自萧家林徒步向和合驿,中道阻水,褰裳涉苇荻中,泥潦没膝,踰里所始得平地。皂隶高谦从旁窃

^① 见《宝庵集》,卷14,页14a-14b。

叹,动不若静,余甚愧之。亭午,至和合驿,饮商百户舟中,午后余舟至,遂发。^①

笔者曾经到名为“和合站”的地点做过考察,此地点载于民国 25 年印制的《河北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郎家铺幅,是老地名。此点之南 200 米就是北运河大堤,据图可知,今日的大堤与民国 25 年的大堤相同,换言之,位于大堤旁的和合站(39°46′15.38″N,116°52′2.23″E),应是清代和合驿所在。

笔者从和合站出发,向西南越过大堤到这片低洼地,现在的景观与张复图所画的情形仍然十分相似,沼泽十分宽广,草树杂生,不辨河道。笔者前行到最远的水涯拍照而回(39°45′42.41″N,116°51′21.25″E。图 164),想象杨士奇在这种地形中“褰裳涉苇荻中,泥潦没膝”,不觉会心莞尔。



图 164 和合驿运河岸之沮洳地(39°45′42.38″N,116°51′21.45″E)

水-50《湾口 李二寺》(图 165)

张复《湾口 李二寺》图,对明代通州大运河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通州为京杭大运河起点,其中李二寺与张家湾,并为大运河常见之发船地点,游李二寺者又可登楼而眺,因而诗人题咏、文人书写,皆极常见。但现在所见的北河,可以直接航行到通州潞河驿下,有何必要离开北河而转入李二寺,迂行到张家湾,才赴通州城呢?张家湾真实的角色究竟为何?为了供给大量旅客发船与下船,必然需要能够停泊大量船只的港口,张家湾如何做到这一点?在张复绘图之前,我们完全无法了解。

李二寺,一名里二泗,二名同音相混,已不辨孰主孰宾。^②除此之外,还有李儿泗、里仁泗、里江泗等多个称呼,亦皆从字音转化。^③李二寺名称中有寺字,其实与寺无关,建在这里的是道观,曾有人以“保运观”名之,主要名称为“佑民观”,至今仍然沿用。《康熙通州志》云:

佑民观,张家湾天妃庙也,旧名里二泗寺,凡运船往来,于此修醮。明嘉靖十四年道士周从善奏

① 见《东里集》,续集,卷 48,《北京纪行录》,页 13a。

② 清人议论,可参看[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卷 37,页 30b。

③ “李儿泗”,见崇祯十六年(1643)杨士聪撰《南行日记》(大兴傅士长恩阁钞本)。又,[清]陆隄其撰《三鱼堂日记》(山东:齐鲁书社,199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559 册),卷 1,页 15a。《附漕河至北京路程》也将该名收入其中。又有里仁泗、里江泗,见图 166。

请赐额,观曰佑民,阁曰锡禧。^①

寺观的主楼称玉皇殿,位于39°49'51.91"N、116°45'13.03"E,明人诗文说有三层,可供登眺。今经重建为二楼建筑。观前有古迹牌坊一座,传说为明清遗物,今设支架保护,位于39°49'48.04"N、116°45'12.70"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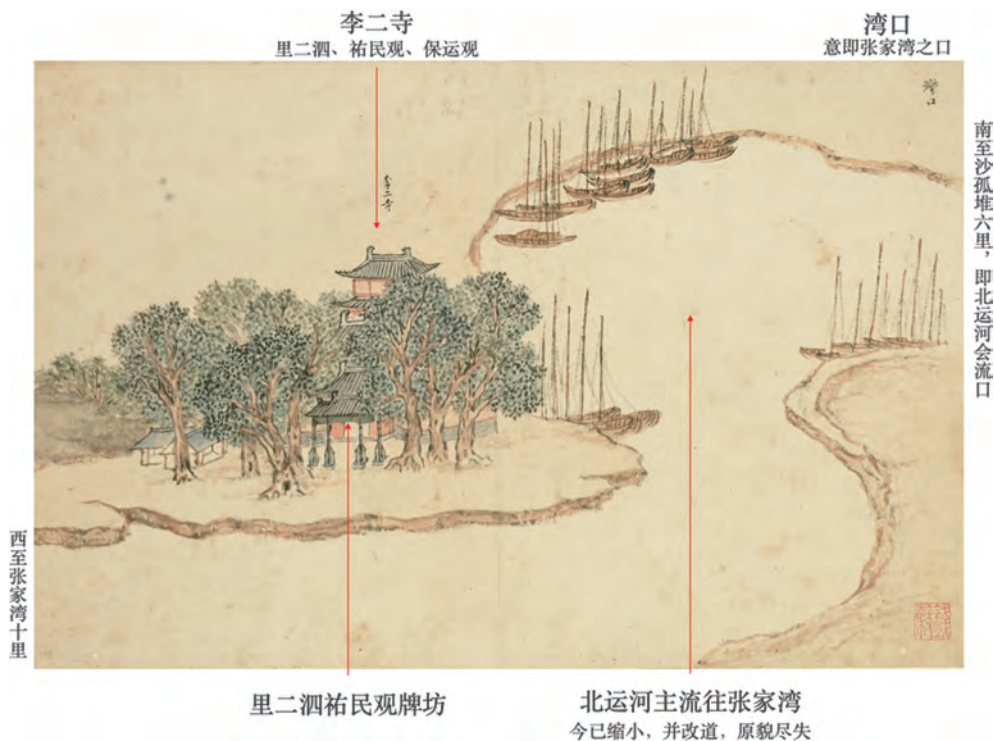


图 165 《水程图》之《湾口 李二寺》

明汤显祖有《出都晚登里二泗道院高阁》诗云:

舻舳聚烟熅,躡舄凌晖皎。旅积方此舒,波情亦增绕。榛丘忆蒙密,重关思窈窕。况此羽人居,青荧满幽眺。双扉永平直,层楼迥飞矫。陵峦翠西矗,河渠白东淼。撞樯密林树,伊优轧鱼鸟。封吟四如画,岐术纷可了。非经灞陵役,复异河阳绕。如何帝乡云,悠然映江表。^②

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汤显祖中进士,观政礼部,至万历十二年甲申除南京太常博士,离京赴任。其时正逢梅雨,出都之期应在端午节后,诗也作于此时。这道观的主神是天妃,陆深《张家湾棹歌四首之二》云:

转湾脱蜃水生衣,惆怅轻船载月归。约略寄居三百石,尽拈香纸礼天妃。^③

从通州到天津,沿途天妃宫不绝于目,此诗写张家湾出发不远,便在李二寺礼拜天妃,以祈航路平安,因李二寺隶属张家湾,所以纳入题目张家湾棹歌之中。

回到张复画面上来,李二寺的道观虽然占在图中的主角之位,但它真正的重点,是在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起终点是通州,实际上,众人发船及下船的起终点是在张家湾,所以张复将此幅的名称标为“湾口”,即取“张家湾口”之意。图中宽大的水流,即北运河自张家湾经由李二寺,流下沙孤堆,而汇入北河的运河主流。从沙孤堆合流处到通州城下的白河河道,反而成为支线。

明人的行记都是从张家湾发船直接下和合驿的,例如陆深《淮封日记》:

① 见[清]吴存礼修、陆茂腾纂《康熙通州志》(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卷2,28b。

② 见[明]汤显祖撰《玉茗堂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册),卷1,页1a-b。

③ 见[明]陆深撰《俨山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8册),卷22,15b。

庚寅[闰五月十七日],晴,辰,发湾下。申,抵和合驿,水涩……遂泊,宿。^①

如此例证甚多,不一一列举。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有北运河到通州的最后一段水程,便是和合驿到张家湾这一段:

和合驿,属通州,又二十里至灤县杨家庄,又二十里至灤县,又十里则火烧屯也。《里道记》:火

烧屯而北七里曰公鸡店,又七里曰沙孤堆,又六里曰保运观,亦谓之李二寺,又十里即张家湾矣。^②

这些地名和里数,合计八十里,极不合理。自和合驿至张家湾,只有 24.316 公里,换算成清里最多 54 里,顾祖禹计算到八十里,错误太大,灤县杨家庄就在清代灤县城东南 1000 米,应将“又二十里至灤县”改为“又二里至灤县”,火烧屯地名只在古代见过一二次,完全查不到,可删去“又十里则火烧屯”,合计 55 里,才符合真正的里数。修改之后,从和合驿至张家湾的水程为:

和合驿,属通州。又二十里至灤县,又二里至灤县,又十里曰公鸡店,又七里曰沙孤堆,又六里曰保运观,亦谓之李二寺,又十里即张家湾矣。

公鸡店,一名公吉店,今名供给店。沙孤堆,一名沙土堆,今名沙鼓村,皆音转。张复所画的,就是沙孤堆六里至李二寺及李二寺十里至张家湾这两段河道。这一点,对于明代大运河河道变化的研究,相当重要。因为在近世地图中,已经看不到张复所画的形象了。请看李二寺河道在民国初期之变迁(图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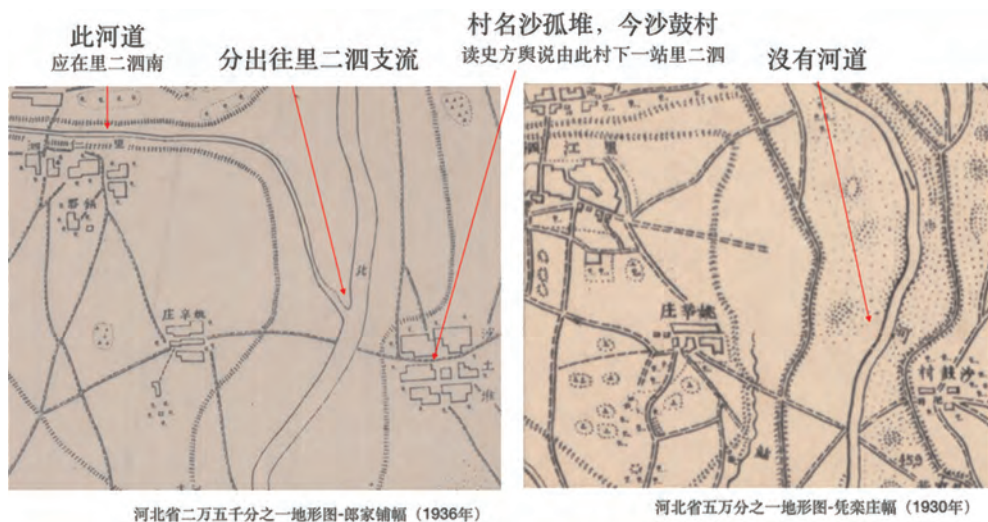


图 166 李二寺河道在民国初期之变迁

图 166 由两张早期地图组成,作为对比,在左边的是《河北省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 郎家铺》(1936 年),在右边的是《河北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凭栾庄》(1930 年)。

在五万分之一地图中,张复所画李二寺佑民观牌楼前的河道,已经完全不见,仅存老河堤;而在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中,老河堤与五万分之一图不全相同,且多了一条小河,但河宽只有白河的五分之一,并绕由佑民观的背后,不但与张复图的河水形象相差太多,水流的方位也完全不同。值得重视的是,这条小河是在沙孤堆村西(39°49'8.17"N, 116°46'49.27"E)注入白河,正好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所说的“沙孤堆—李二寺—张家湾”的明代河道相合,因此,即使这条小河与张复图中的形象相差太远,而且现在已经修成马路,完全不见形迹了,我们仍然可以借由张复图、《读史方輿纪要》水程记载、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上的残河,知道明代北运河

① 见《俨山外集》,卷 8,《淮封日记》,页 2a。

②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 129,页 5487。

的主流河道就是在李二寺这里。

水-51《张家湾》(图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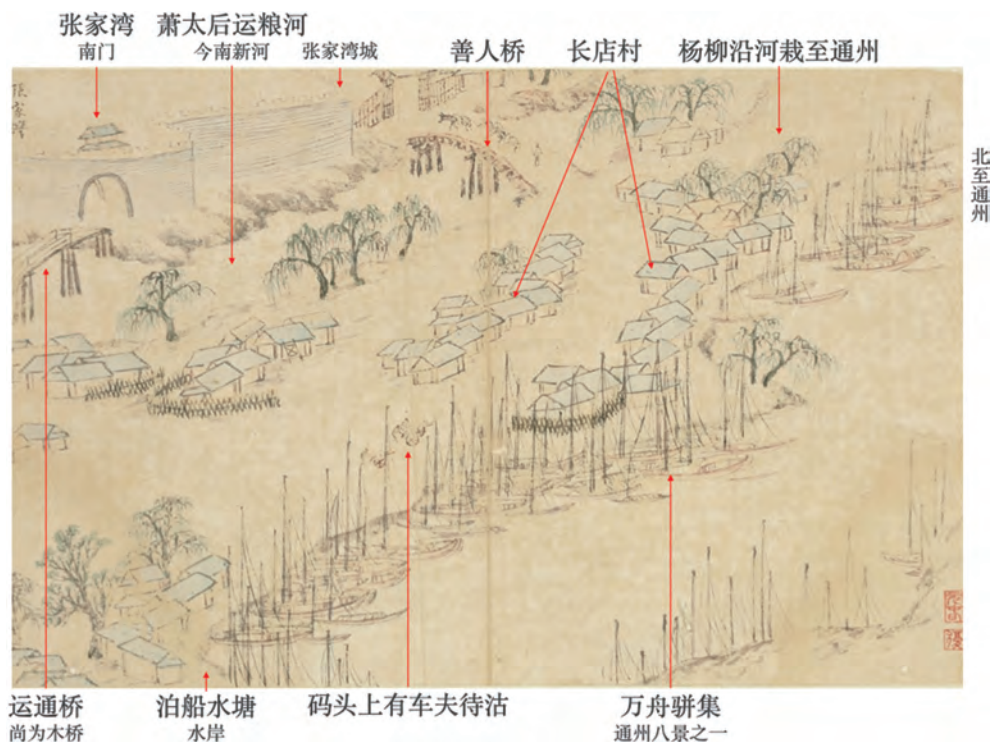


图 167 《水程图》之《张家湾》

张家湾和通州是大运河舟行旅客的双终点站,两站的功能并不相同。从明清行记的记载中发现,各方旅人到了这两个站,有四种选择:

- (1)北上时:在张家湾起陆,然后租车到北京,也有租车到通州城的;
- (2)北上时:在张家湾不下船,继续航行到通州潞河水马驿(即通津驿),才起陆入京;
- (3)南下时:若在张家湾登舟,可再分两路,一路直接自北京陆行至张家湾登舟,一路经通州城再至张家湾登舟;
- (4)南下时:在通州潞河水马驿(即通津驿)登舟,然后经张家湾南下。

这四种选择,以第一及第四种的人数最多。下面这一组引文,都是在张家湾起陆,然后租车到北京的例子。

九月三十日[1414/10/13],晴,亭午至张家湾,买车。(杨士奇《北京纪行录》)①

五月朔丙辰[五月初一,1479/5/21,2261403],至张家湾。戊午[五月初三],入京城。(吴宽《己亥上京录》)②

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三日,1492/8/15,2266238]……五十里至张家湾。自建昌至此三旬有八日,

① 见《东里集》,续集,卷48,《北京纪行录》,页13a。
② 见《匏庵家藏集》,卷57,页8b。

历江、淮、齐、鲁、幽、燕,无虑五千里,若不劳顿者,行亦从容也。(张升《北行录》)①

七月十一日[1516/8/8,2274997],午,至张家湾。七月十四日,入都城。(严嵩《北上志》)②

庚申[十月初三日,1597/11/11,2304667],一鼓抵张家湾。辛酉(十月初四日),大风如霆,乘马行六十里入国门。(文震孟《北征纪行》)③

自张家湾到京,又费车脚盘缠银四两,其难如此。(庄元臣撰家书)④

廿七日[二月二十七日,1540/4/4,2283637],……酉刻,着张家湾。朔旦,(三月一日)辰刻,车马簇簇,先俾进贡物盘运。二日,巳刻,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车各马九疋挽之),马以驮人。申刻,入京,从崇文门而入。(策彦周良《初渡集》)⑤

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七日,1488/5/8,2264677],至张家湾,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二十八日,舍舟乘驴,过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臣等于西门外,乘驴过永济寺、广惠寺,至崇文桥,桥在北京城门之外。杨旺……等,引臣步入皇城东南崇文门,行至会同馆。(崔溥《漂海录》)⑥

这是第一种选择,买车,就是租车。八个例子中,前七例都是直接进入京,只有第八例经由陆路绕行通州城。

第二种选择者,如张复《水程图册》再补之《通州》图,水行至通州城,便属于这种选择。日本僧允澎也选择至通州城才起早,《允澎入唐记》云:

廿五日[九月二十五日,1453/10/26,2252065],通州通津驿[按:泮为津字之误],马船、快船、孔船、站船、运粮船等四来诸船皆系于此。廿六日,驿丞官出车马驿驴,日众各乘之赴京。⑦

允澎乘舟至通津驿,抵达时见到驿旁有大量公务船,他各种停泊船只而记录之,其中站船即驿站之船,马船用于驿及渡等⑧,运粮船为漕运船,皆为公务船。他们一行人在通津驿下船次日,骑驿驴入京。此外,自通州也可以乘船入北京⑨,但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行记。

第三种选择,如归有光《壬戌纪行》及李若讷《使还畿辅诸河行记》,都是在张家湾买舟,以此为“河舟第一程也”;⑩张邦奇《南行记》乃陆路出崇文门至通州城,再抵张家湾,然后登舟。⑪ 不过,实际旅行时,变数也不少,如薛冈《丙辰南归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九月朔出京时,肩輿到通州,本拟登舟,最后让船自己开行,本人陆行到河西务上船,却又不上船,再骑马至临清候舟。⑫

第四种选择,如陆深《淮封日记》便是在潞河乘驿舟,经张家湾南下。⑬ 下面以陆深《南迁日记》为例:

① 见《张文僖公集》,卷13,《北行录》,页10a。

② 见《钤山堂集》,卷27,页8a。

③ 见《北征纪行》,页527。

④ 见[明]庄元臣撰《庄忠甫杂着》,十一月廿五日家书,页10b。

⑤ 见《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卷下,页78,总页233。

⑥ 见《锦南集》,卷5,页1b-2a。

⑦ 见[日]允澎撰《允澎入唐记》(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收入《续史籍集览》第1册),页16,总页528。“孔船”不明。

⑧ 见《乾隆江南通志》,卷97,页30a:“房村驿,原设马船二十只。”又,卷98,页18b:“贵池水驿,原设差马船十只。”[明]沈孟化修、张梦柏纂《万历江浦县志》(明万历刻本),卷1,页8b:“设江淮卫于县治东隅,拨马船于江淮、浦子口二渡。”

⑨ 见《一统路程图记》,卷5,页1b,《南京由漕河至北京各闸》云:“十里张家湾,十五里普济闸,通州、庆丰闸、文明闸、会川闸,共四十五里至北京。”先由张家湾舟行至通州,再由通州行船入北京。

⑩ 《壬戌纪行》(下),见《震川先生文集》,别集,卷6,页1a。《使还畿辅诸河行记》,见《四品程》,卷6,页30a-31a。

⑪ 见《靡悔轩集》,卷2,页6a。

⑫ 见[明]薛冈撰《天爵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5册),卷6,页4b-5a。

⑬ 见《淮封日记》,卷8,页1b-2a。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二十九日[1529/5/6,2279652]甲子,予晓自曹氏南园行,……午,抵潞河。是日晴爽,不甚疲惫,入长船中小憩。……是夜,宿大通桥东。三十日乙丑……晚,微雨滴滴,蓬窗有声,再宿旧泊。孟夏朔日丙寅,……再宿旧泊。

四月二日丁卯,晓,大风,……辰刻,遂解维。……夜宿李释儿寺北里许,以水涩故也。

四月三日[1529/5/10/]戊辰,晴,移舟甚艰。薄暮,风沙遂息,是夜宿和合驿。^①

由于通州的潞河及张家湾是大运河的始发或终点站,送远行者,接远至者,常常连日停泊。陆深南迁,迟迟其行,三宿方自潞河发舟,他未停张家湾,到李二寺方泊,李二寺写成“李释儿寺”。

以上,是北京旅客上下大运河船的四种选择,笔者利用卫星地图作了一张解说图(图168),将明代北运河主流由沙孤堆转入李二寺、抵张家湾,以及舟抵张家湾之后,往北京和通州的水陆交通线,都画在一起。自张家湾直接西行入北京,陆路可由黄色道路,水路可由蓝色的萧太后河,入沙窝门(广渠门)较近。如要再乘船至通州,可从蓝色细线这条道路,陆路也差不多平行。到通州之后,可由通惠河至北京大通桥,由东便门进城至崇文门,水陆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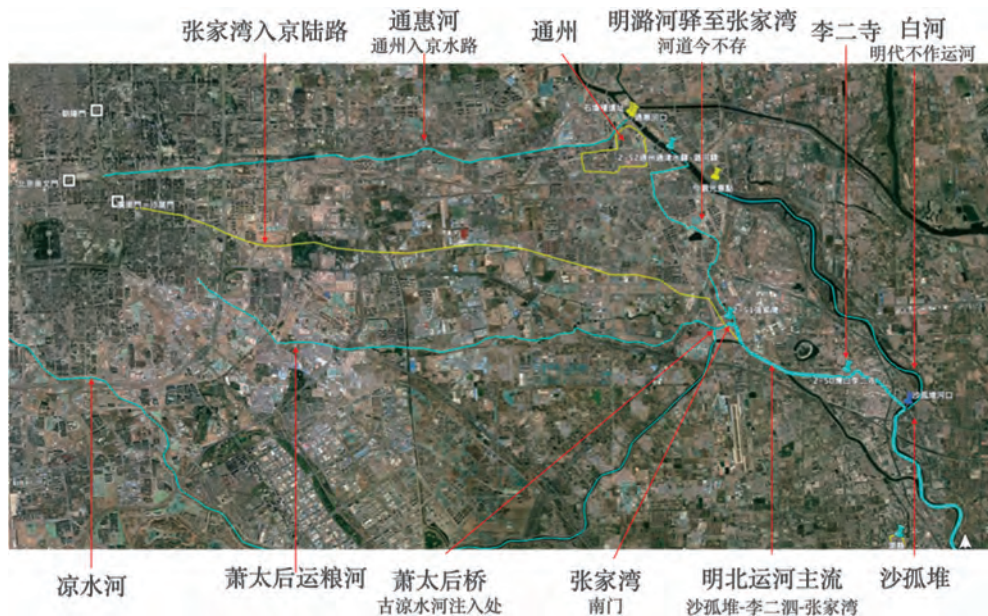


图168 张家湾作为大运河终点之对外交通

张家湾的市况繁盛,自不必说,它有独自の城郭,图中的城门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笔者在2019年12月进行考察时,部份城垣仍有残迹,城南门外的运通桥,仍是明清时代的古迹。张家湾城不大,图中从城门向东画到城墙转弯,改用淡笔处理。

图169是黄昏时自东向西拍摄的运通桥,《康熙通州志》说:

通运桥,张家湾城南,旧名南门板桥,岁久板腐,人畜多伤,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太监张华题请改建石桥,建福德庙、文昌祠以镇之,费数万金。^②

由此可知,张复在万历二年绘图时,此桥还是木桥,张复离开后,才改建为石桥。现存的是石桥

① 见《俨山外集》,卷9,《南迁日记》,页1a-4b。

② 见[清]吴存礼修、陆茂腾纂《康熙通州志》(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卷2,页19b。

古迹,保全良好,桥面经过四百年的碾压,中间有三条古车辙,两轮的幅距分别是 130 公分、105 公分、116 公分,宛然古趣。笔者指示学生实测石桥南端(39°50′52.49″N,116°42′9.54″E)到北端(39°50′53.63″N,116°42′8.58″E),得桥长 46.5 米、桥头宽 13 米、桥上宽 7.16 米、桥下河宽 34.5 米,是大运河常见的宽度;桥洞高 7.25 米。石桥北端,距离张家湾城南门口仅 2 米余。桥下跨越的河道,明人称萧太后运粮河^①,今称萧太后河,又名南新河。自张家湾入京的客商,如果不经通州城,可循萧太后河航行,不过,主要还是走陆路,经大通县,由沙窝门(即广渠门)入京。

落日、古桥、张家湾城

自39°50′54.9″北,116°42′10.974″东拍摄



图 169 张家湾城南门大桥(通运桥)之落日

由于张家湾的重要性,一般人可能会比较关注张家湾城和南门通运桥,但张复作画时,并不以张家湾城和南门桥为重心,而是放在张家湾南面的大型码头上。《读史方輿纪要》说:

漕河至州南十五里曰张家湾,东南运艘毕集于此,乃运入通州仓。^②

张复应该是目击了“运艘毕集”的景观,想要画下这一个全场特征。为此,他采取类似录像方式,以移动镜头来取景,他站在运通桥头以南约一二百米的位置,以逆时针方向,自右向左,依次将离自己最近的泊船水塘、码头车夫、长店村,善人桥、南新河,一直到张家湾南城墙,拍摄了一圈,最后,把镜头停在张家湾南门的通运桥。

善人桥就是我们看到的通运桥右侧的另一座桥,当时也是木桥,明万历三十三年与通运桥同时改建为石桥,不过,现在已经全无影迹了。《康熙通州志》云:

善人桥,在张家湾城南长店,旧小石垒成,明万历三十三年水冲,税监张华易以大石桥,南建万缘庵、土地祠,共费四千余金,得磁佛像于桥下土中。^③

善人桥南端,地名长店,“通州八景”中有“万舟骈集”,便是此长店村的风景,《康熙通州志》云:

州城东,自潞河驿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无舟不集市,沙鸟汀葦,村居岸柳,望之可入

① 见[明]刘侗撰《帝京景物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卷3,页79a。

②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129,页5487。

③ 见《康熙通州志》,卷2,页19b。

画图。①

张复画中所见,与上述文字描写,若合符节相,长店村即图中之地可知矣。

长店村南的水面,万艘云集,而张家湾城南的河面,并无停泊或航行船只,可见张家湾城的河道,只能通过,不许停船,而长店村南的水面,才是张家湾的大型码头港湾。此种大量船艘停泊的情形,与淮安府西门外十分相似,淮安西门外是官河(里运河)的河道供作停泊,此处却是水塘而非河道,是北运河终点的停船港湾。张复取景的立足点,就在这一片泊船水塘的尽头,仔细看图左下角这排房舍之前,还画出了水塘的岸线。

最后,再说一点,这个万艘云集的泊船码头,和凉水河有什么关系呢?

张复时代的凉水河,现在被改道了。笔者仔细比对二万五千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地图及“天地图”等之后发现,彼时凉水河在今萧太后河桥下与萧太后河会流(39°50'49.25"N, 116°41'49.56"E),然后共同流到张家湾城南的通运桥、善人桥下。换言之,凉水河已经是张家湾城南运通桥下的河道了。②

以上,利用解说张复《水程图》的机会,对张家湾的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本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画出了长店村水塘可泊万艘的真相,解开了张家湾如何容纳庞大数量船舶的秘密,确定了张家湾成为明代大运河起点与终点的事实。

水-52《通州》(图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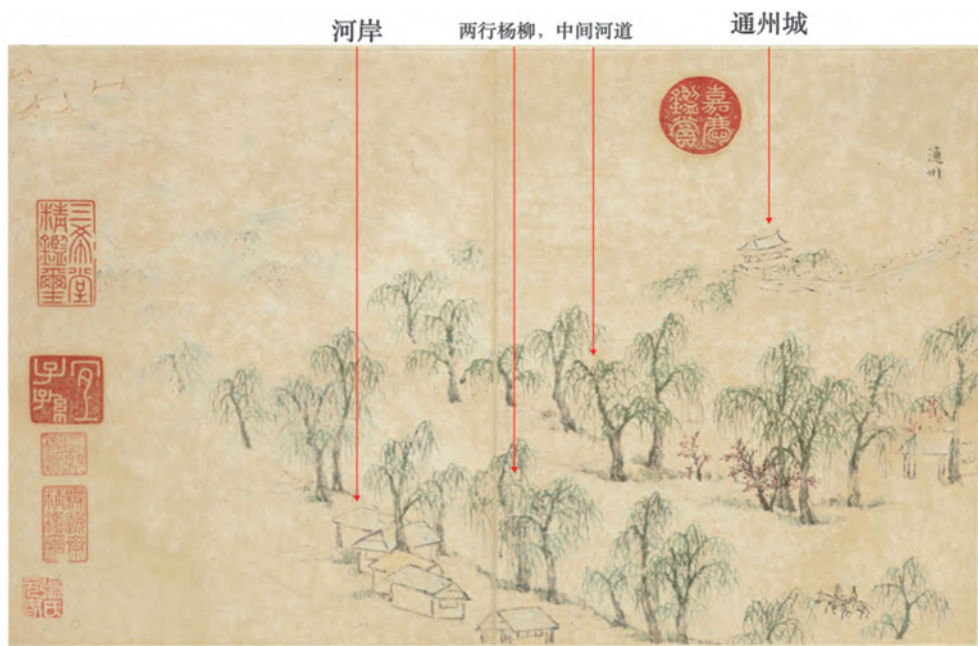


图 170 《水程图》之《通州》

张复此图,将通州城置于远程,隐约呈露;近处是两行杨柳,由于房舍前有岸线,以此判断,两行杨柳之间应为水道。陆深在《淮封日记》中还说,河道两旁,杨柳霏霏。

① 见《康熙通州志》,卷1,页15a。

② 关于现代的凉水河,下面再作一些说明。现今凉水河经过改道整修之后,不入萧太后桥,在萧太后桥以南400余米的马曹桥下(39°50'49.25"N, 116°41'49.56"E),便向东转折,从全新开凿的河道,流到今玉带桥(39°50'30.13"N, 116°42'31.89"E)。在39°50'29.78"N, 116°42'32.73"E处接纳萧太后河,然后朝东南流到通州区潞县水务一所的现代闸口(39°47'31.44"N, 116°47'8.83"E),由此注入白河(北运河)。换言之,今日的新凉水河,从张家湾、长店村这一条连线以南约五六百米处流过,因为相隔五六百米,不会在张复的画幅中看到。

己丑[闰五月十六日,1512/6/29],晴,晨啜米饮,别定之。辰时,入通州城察院暂息。午,出东门,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马也。申初,抵张家湾,过座船。作京中报书与钦之,略云:坐驿舟下潞河,行二十余里,鸣金伐鼓,与棹歌互答,两岸蒹葭杨柳渺然,极江湖之兴……^①

从张家湾到通州有水陆两途,水路迟缓,但也比较舒适,王世贞家眷可能坐船选择,张复也随同舟行。

可惜张家湾与通州城之间这条河道,不敌时代变迁与城市改造,现在已不复旧貌,笔者虽然找出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连缀成一条隐约的河形,但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

到此,张复的《水程图》已经全部结束了。关于这次行程的日数,如果王世贞是在二月一日[1574/2/21,2296013]从太仓西关出发,三月十六日[1574/4/7,2296058]入京,则前后共计四十六日。但王世贞说的是“以三月望后入都门”,并非肯定之辞,则日数还会略有增加。

一般而言,大运河的行程日数可以预计,以万历十二年(1584)顾绍芳《北征记》所述为例。他于八月八日(1584/9/11,2299858)辰刻在昆山西关登舟,十月十八日(1584/11/19,2299927)入都,抵达崇文门时,日入崦嵫。前后七十天,全部水程。顾绍芳说:

是行也,首尾凡七十日而达,中间停舟之日几三之一,以是视常期少淹云。^②

换言之,顾氏认为的水程常期,就是四十六七天。王世贞只用了四十六天,与顾氏所说的常期相同。所以,如果能够依照水程的常期,王世贞就不必在徐州起旱陆行,以避免挂误程限。然而,经过徐州时水程淹滞,使他担心而登陆。

5 结论

以书面文献来研究古代,有三大隔。一是文字隔,古人写作诗文,今人在后解读,写者有笔力不到之憾,读者也有如雾看花之难。二是识见隔,见识能力,随人不同,比如高攀龙《武林游记》写自其家至杭州的往返所见,《三时记》写自其家贬谪潮阳的往返纪程,但他的眼界对于沿途山川及人文景物甚少关心,因而用途不大。三是分别隔,一般人写作纪行诗文,使用地名多半与众人相同,而分别心强的作者,或自恃本身的专业,常会与众人不同,如周洽《看河纪程》。周恰奉河道总督靳辅之命绘制黄运两河图,亲自从清江浦河署起程,一路考察到晋陕之间,他去时走黄河北堤,回程刻意走黄河南堤,考察相当仔细,但是,他所记录的地名,在别的书中可以查找到的,不足十之二三,虽然他数里就记了一个地名,实际上用处不大。

然而,钱穀《纪行图册》和张复《水程图》,以专精的画笔,准确的写实,为明代京杭大运河提供了后人目击可知的真实形象,完全突破了古文献的三隔,有很高的价值。

笔者对钱穀《纪行图册》三十二帧和张复《水程图》五十二帧作品,作了逐一解说,现已全部完成。有两点说明、五点结论、一个总结,列述于下。

第一点说明,是关于原图的排序错误的问题。两个图册的原始排序人不知是谁,如果是画者自排,就是画者自己疏忽了,如果是后人所排,就是后人排列错误。笔者已经全部予以指出,并按照正确位置,重新加以排列了。

第二点说明,是关于本论文的读法。一般论文是以议题来引领文章的脉络,本文是以钱穀与张复的原图为脉络,每一幅图下面的解说文字都是独立的,可以从任何一幅单独去看。又因为解说文字本是为原图服务,

① 见《淮封日记》,卷8,页1b-2a。

② 见《宝庵集》,卷14,《北征记》,页15a。

所以,阅读时务须细看原图。文中对原图辨识如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教。

结论一,《纪行图册》和《水程图》宛如一箱明代的纪录影像。钱谷与张复作画时,对于地理方位、河道曲折、城市面貌、房舍结构、山脉隐现、时事状况,都自然真实地呈现了。对于读者而言,并不只是观看了明代古画,其实是得到了一箱明代的照片和录像光盘。比如说,明代的驿站,图中就画出了三种建筑形式,其中一种还与明代青州府益都县青社驿的古迹实物相同。又比如说,《东阿县志》记载张秋浮桥由六艘船组成,我们在张复的《张秋》图中,看到樵楼下泊靠两端的浮桥正是六艘,而且写实到这样精细的程度的,不只是一幅而已。又比如说,我们常看到史书中有“京师戒严”这一类的语词,张复在山东、河北的图生动地画出了加强警备的木栅设施。大江南北受倭寇侵扰,众多的烟墩也因缘而生,可见于多幅图中。明代中晚期,是黄河想要从南行徐淮返回北流故道的年代,多次河决,对大运河起了重大影响,图中也画出了曲头集筑堤、夹沟驿水坝、新河四闸、夏镇新造等河工的时事。总之,这样大量的影像数据,内容精奇,趣味横生,又可资考古,价值极高。

结论二,钱穀与张复突破了传统绘画美学的技法,运用与现代照像与摄影相同的观念,使写实画法自然成立。钱穀也好,张复也好,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写实任务,他们好像拿着照相机或摄影机,遇到适合用相机拍照的,就拿出相机拍成平面相片,如奔牛、吕城、白洋河、东昌府、天津、李二寺、河西务等;遇到大场景,需要连续拍摄的,就拿出摄影机,如苏州金阊、浒墅、济宁、临清、张家湾,拍出了很好的纪录片。就取景的角度而言,有时采用定点拍摄,有时采用沿路走摄,有时采用空中鸟瞰,非常灵活。这种记录真实的艺术能力,已经不是传统画论所能涵括的了。

结论三,二人对图件内容的取景范围,有意识地采取了距离限制。人类的视力有各种可能,如果条件十分充分,在新疆乌布泊河上,也可以望见远在130公里外的天山雪线,平常眺望二三公里距离的景物,并不稀奇,我也常常在任教的中山大学(位于高雄)文学院七楼上遥望旗津灯塔,直线距离2,350米。可是,除非要拍大景、远景,我们一般不会大距离取景,而是专注一个距离有限的目标。钱穀与张复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画作中执行了取景的距离限制。具体地说,他们如果是以照片概念处理,通常是300米是界限,其中200米以内是核心;如果想处理超过300米以上的景物,则会以录像的概念,用连续镜头去处理,所处理的最远距离,以大约700米为限;如果更远处有必要摄入的目标,或者处理的对象本身就是特大场景,他们也会使用浮云或模糊技法,来区隔远近距离的对象,并尽量避免扩大得太远。这些限制距离的原则,使我们更容易诠释画面的内容,例如,《浒墅》图只截取浒墅关口为核心;《张家湾》图画了一条泊船万艘的水塘,研究者可能会怀疑这条河道是凉水河,但如果注意到限制距离的原则,便会否决这种推测,因为古凉水河的位置在张复设定的观景限制距离之外,而且,现代的凉水河被整治而改道,与萧太后河而为一,流过张家湾城南运通桥下,必然不是《张家湾》图中的泊船水塘。诸如此类,这一原则对于我们辨识图中对象非常有帮助。

结论四,发前人所未见,找到明代大运河的真正起点与终点。一般人说京杭大运河,意即杭州至北京,或是杭州至北京通州,那究竟从杭州何处发船?通州何处下船?以搭乘高铁为例,上下车站与平时认知的城市名称并不相等,如上海的虹桥站,距离上海旧城区十分遥远;高雄的高铁终点站是左营站,距离旧市区五六公里。所以,笼统说通州或杭州,并不充分。经过研究钱穀与张复的画作,笔者发现钱穀所画的《得胜坝》,才是大运河杭州的真正起点。钱穀在图中详细画出得胜坝的西坝,如何接纳杭州武林门北来的河流;得胜坝的东坝,如何接受上塘河的客货。由此使我们豁然解,原来从杭州出发的客货,必须以船、马、轿从城中来到得胜坝,再由此登船出发;反之,经由大运河南来的客货,在北新关课税之后,到得胜坝结束全部水程,才更换车马轿船,进入武林门。大运河行船的北方终点,是以张家湾与通州潞河驿为双终点,利用张家湾作为终点站或始发站的旅客,不少于潞河驿。由于古今变迁,从文献记载到现代地面,都只能给我们关于张家湾模糊而朦胧的

印象,我曾经三次考察,把可能的河道的古今变化都计算了,都不能了解张家湾为什么被认为是京杭运河北端的起终点,也不了解它与通州潞河驿的关系。解读了张复的《李二寺》及《张家湾》两图,才知道明代的北运河的主要运道,并不是顺着白河(北运河)直上通州城,而是在沙孤堆村西面离开白河,转入李二寺,经过李二寺佑民观之南,到达张家湾的南门。而且,在张家湾南门外的长店村,有着巨大的泊船水塘,可以形成超大型的码头。有了主要运道与大型泊船水塘码头,张家湾作为大运河北端的起终点,才能成立。这个结论,无疑会彻底改变吾人对明代大运河的认识。

结论五,本文研究《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方法,将会影响未来数字人文研究的观念,带来巨大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于使用书面材料,从字面解读古代文献,因而产生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法。但是,各人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和应用相当分歧:有的人只把它作为美术品的数字展示辅助;有的人利用 GIS 的运算套件正在以计量工具切割古典文献;有的人想利用 AI 技术,对古代文集、古代地图、古代史料进行自动辨识,自动撷取,来发现问题,甚至解决问题。这些想法,都无可,但不可避免地会走上以数字为主体,而人文被宰割的结果。其实,数字人文,应以人文为主,数字工具只是用来辅助人文研究的不足。本文在解读《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过程中,以画作为尊,以科技为辅,活用了大量数字化的技术方法,具体落实在每一页画作内容的解说,从而把画者的本心开发出来,与作画者携手回到明代的时空里,看见明代的真实。这样的数字人文方法,必然会成为下一代的主流。

总结——钱谷与张复所取得的不只是绘画成就,他们短幅用照片、大幅用录像,留给我们一份明代大运河的写真集,《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大运河研究的集体未来。笔者逐一为每一幅图作详细解说,指出他所画的每一个点是什么,读者随着本文如同航行河上,可以从影像直击明代大运河航道的真实样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同时制作了 GIS 互动平台,纳入“天下通衢——中国历代水陆交通全图”,以“第二部 明代京杭大运河之钱谷《纪行图册》及张复《水程图》专题”呈现(图 171),文中所解析的每一幅图,均已全部数字化,读者配合期刊文章的进程,浏览本网站的大运河水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钱穀与张复的高清原图,网址是:<https://see.org.twmqrlmqrlgis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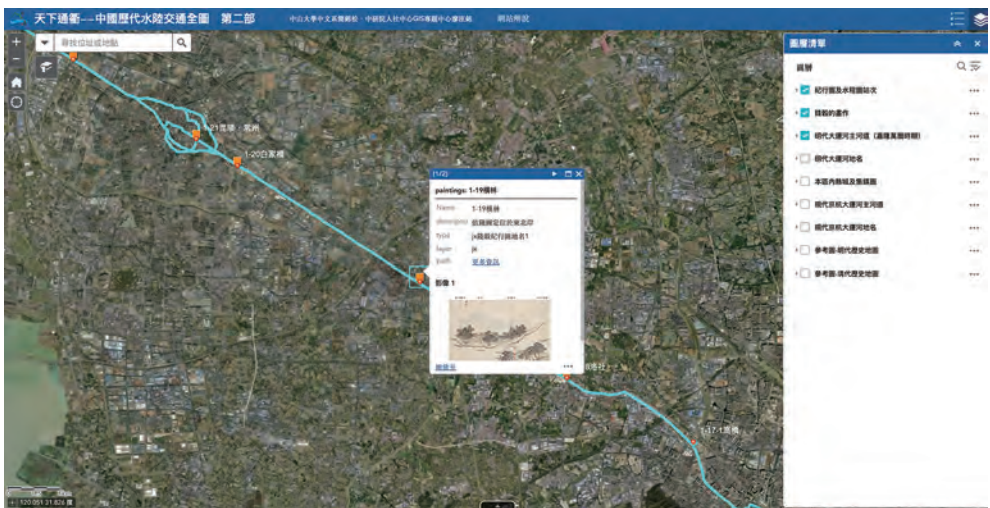


图 171 GIS 互动平台截图

明代永乐年间修复大运河以来,至现代京杭大运河重建,共有六次重大变迁,本网站配合张复的旅行,将其中一次重大的变化,即“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开始通漕之前”的京杭大运河,其全部水路与沿线重要地名都作了数字化,读者可以离开《纪行图册》和《水程图》,把它作为

明代中期京杭运河的电子地图,运用于大量的明清文史研究项目,其精准程度与便利的应用,非任何地图可以相提并论。笔者同时发布了现代重整新修后的京杭大运河,让读者可以作古今对照比较。

(全文完)

引用书目

一般古籍

〔北宋〕郭忠恕制《雪霁江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楼钥撰《攻媿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55册。

〔元〕方回撰《桐江集》,明范文恭旧钞本。

〔元〕王恽撰《秋涧先生大全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66册。

〔元〕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08册。

〔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明〕吴宽撰《匏庵家藏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收入《四部丛刊》初编第83册。

〔明〕文震孟撰《北征纪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0册。

〔明〕王世贞撰《适晋纪行》,见《弇州四部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王直撰《抑庵文集》,明景泰五年应天府丞陈宜刊本。

〔明〕王穉登撰《客越志》,清顺治丁亥四年两浙督学李际期刊本。

〔明〕王慎撰《弘治庚戌治河记》,见〔清〕阎廷谟重纂《北河续纪》,清顺治九年刻本。

〔明〕王鏊撰《震泽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56册。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明〕朱珔撰《乐律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213-214册。

〔明〕沈周《两江名胜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明〕祁彪佳撰《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收入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7册。

〔明〕祁彪佳撰《越中园亭记》,清宣统三年绍兴公报社铅印本。

〔明〕李东阳奉敕撰《大明会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

〔明〕李若讷撰《使还畿辅诸河行记》,见《四品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收入《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0册。

〔明〕吴与弼撰《康斋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51册。

〔明〕邱云霄撰《北观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7册。

〔明〕涂山辑《明政统宗》,明万历年刻本。

〔明〕姚广孝撰《逃虚子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28册。

〔明〕孙矿撰《书画跋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816册。

〔明〕徐充撰《汴游录》,明万历丙午原刊本。

〔明〕陆深撰《俨山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8册。

〔明〕陆深撰《南迁日记》《淮封日记》,见《俨山外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7册。

〔明〕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 [明]陈仁锡辑《八编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40-1246册。
- [明]陈睟编《吴中金石新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83册。
- [明]陆治制《白岳纪游图册》，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 [明]张升撰《北行录》，见《张文僖公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册。
- [明]张邦奇撰《南行记》，见《靡悔轩集》，合肥：黄山书社，2013。收入《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20册。
- [明]张复制《水程图》上中下三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卷为张复仿钱穀《纪行图册》；中卷及下卷为张复自创画作，中卷自邵伯至张秋；下卷自东昌至通州。
- [明]张选舜撰《忠谏静思张公遗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3册。
- [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
- [明]屠隆撰《由拳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0册。
- [明]庄元臣撰《水程日记》，见《庄忠甫杂著》，项永言斋清初抄本。
- [明]冯时可撰《西征集》，明万历间刊本。
- [明]汤显祖撰《玉茗堂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册。
- [明]靳学颜撰《靳两城先生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2册。
- [明]黄汴编撰《一统路程图记》，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66册。
- [明]杨士奇撰《北京纪行录》《南归纪行录》，见《东里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39册。
- [明]杨士聪撰《南行日记》，大兴傅士长恩阁钞本。
- [明]杨宏撰《漕运通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6册。
- [明]卢雍撰《北上纪》《南归纪》，见《古园集》，台北：明崇祯六年卢翰重刊本。
- [明]刘侗撰《帝京景物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 [明]朱国祯撰《皇明大政记》，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册。
- [明]薛冈撰《天爵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06辑第25册。
- [明]钱穀制《纪行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明]钱穀制《钱叔宝白岳游册》（《白岳游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明]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5册。
- [明]谢肇淛撰《小草斋续集》，日本内閣图书馆藏本。
- [明]谢肇淛撰《北河纪》，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6册。
- [明]戴澳撰《杜曲集》，明崇祯间刻本。
- [明]归有光撰《震川先生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收入《四部丛刊》初编第76册。
- [明]归有光撰、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明]严嵩撰《北上志》《西使志》，见《钤山堂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景印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
- [明]顾炎武撰《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
- [明]顾绍芳撰《宝庵集》，明万历壬子年刊本。
- [明]龚立本撰《北征日记》，见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龚立本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18。

〔清〕不着撰人,清陈劭校《周行备览》,清乾隆三年序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典藏。

〔清〕王初桐撰《北游日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收入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30册。

〔清〕毛奇龄撰《西河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20-1321册。

〔清〕江萱制《潞河督运图》长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吴兰修撰《南汉记》,清道光十四年郑氏淳一堂刻本。

〔清〕邵长蘅撰《邵子湘全集》,清康熙间刻本。

〔清〕邵远平撰《戒山文存》,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0册。

〔清〕周洽撰《看河纪程》,刻本。

〔清〕军机处档折件《荆山桥至新旧沛城相距道路里数图》,清乾隆四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高懋功撰《云中纪程》,台北:广文书局,1962。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第6帙第3册。

〔清〕陈万策撰《近道斋诗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8册。

〔清〕陈梦雷主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34。

〔清〕陆时化撰《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清〕陆嘉淑撰《北游日记》,北京:线装书局,2003。收入《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6册。

〔清〕陆陇其撰《三鱼堂日记》,清同治九年浙江书局刻本,山东:齐鲁书社,1997。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9册,〔清〕阎廷谟重纂《北河续纪》,清顺治九年刻本。

〔清〕张鹏翮撰《治河全书》,清抄本。

〔清〕屠倬撰《是程堂集》,山东:齐鲁书社,1997。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3册。

〔清〕黄春圃辑《山东运河图说》,清钞本不分卷。

〔清〕焦循撰《雕菰集》,山东:齐鲁书社,1997。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89册。

〔清〕傅泽洪撰《行水金鉴》,清雍正三年刻本。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清〕端方撰《壬寅销夏录》,稿本。

〔清〕谈迁撰、汪北平校点《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收入《四部丛刊》续编。

〔清〕顾廷纶撰《北征日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收入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34册。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

〔清〕麟庆撰《河工器具图说》,旧钞本。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系统》,含《明实录》《清实录》外大量文献。网址:
<http://hanji.sinica.edu.tw>

方志

〔宋〕史能之纂《咸淳重修毗陵志》,明初刻本。

〔明〕佚名《洪武无锡县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92册。

〔明〕王命爵等纂修《万历东昌府志》,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 [明]王鏊纂《正德姑苏志》，正德元年刻本。
- [明]尤麒、陈露纂辑《嘉靖武城县志》，明嘉靖刻本。
- [明]牛若麟修、王焕如纂《崇祯吴县志》，明崇祯刻本。
- [明]包大燿纂修《万历兖州府志》，明万历元年刻本。
- [明]沈孟化修、张梦柏纂《万历江浦县志》，明万历刻本。
- [明]吴翀、李庶纂《弘治重修无锡县志》，明弘治九年刻本。
- [明]吴敏道撰《万历宝应县志》，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 [明]卓天锡修、孙仁增修《成化重修毗陵志》，明成化刻本。
- [明]周士佐修、张寅纂《嘉靖太仓州志》，明崇祯二年重刻本。
- [明]周世昌撰《万历重修昆山县志》，明万历四年年刊本。
- [明]唐浩修、齐柯纂《万历和州志》，明万历三年刊本。
- [明]郭大纶修、陈文烛纂《万历淮安府志》，明万历刻本。
- [明]张采纂、钱肃乐修，〔清〕顾沅辑《崇祯太仓州志》，明崇祯十五年原刊，清康熙十七年修补刊本。
- [明]张恺纂《正德常州府志续集》，明正德八年刊本。
- [明]张德夫修、皇甫沅纂《隆庆长洲县志》，明隆庆五年刻本。
- [明]梅守德修、任子龙纂《嘉靖徐州志》，明嘉靖间刊本。
- [明]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残本。
- [明]喻文伟修、刘筹纂《万历宿迁县志》，明万历刻本。
- [明]杨洵、陆君弼等纂修《万历扬州府志》，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
- [明]杨逢春修、方鹏纂《嘉靖昆山县志》，明嘉靖刻本。
- [明]刘广生修、唐鹤征纂《万历常州府志》，明万历四十六年。
- [明]戴日强纂修《万历杭州府志》，明万历七年刻本。
- [明]郑瀛修、何洪纂《嘉靖德州志》，明嘉靖七年刻本。
- [明]萧蕃修、郑孝纂《嘉靖兴济县志》，民国钞本。
- [明]韩晟修、陈士彦纂《万历河间府志》，明万历刻本。
- [清]丁廷榘修、庄日荣等纂修《乾隆沧州志》，清乾隆八年刊本。
- [清]丁灿纂修、张煥续修《光绪故城县志》，民国 10 年重刊本。
- [清]于琨修、陈玉璠纂《康熙常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 [清]于睿明修、胡悉宁等纂《康熙临清州志》，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 [清]王其淦修、汤成烈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 [清]王时来修、杭云龙纂《康熙阳谷县志》，钞本。
- [清]王昶纂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清嘉庆七年刻本。
- [清]王峻修、石杰纂《乾隆徐州府志》，乾隆五年刊本。
- [清]王道亨修、张庆源纂《乾隆德州志》，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 [清]王赠芳、王镇修、成瓘、冷烜纂《道光济南府志》，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 [清]白为玗纂修《康熙东光县志》，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 [清]沈家本、荣铨修、徐宗亮、蔡启盛纂《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清〕宋起凤原本,温仲和纂《光绪嘉应州志》,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清〕李贤书修,吴怡等纂《道光东阿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清〕李铭皖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刊本。

〔清〕何绍章修、吕耀斗纂《光绪丹徒县志》,清光绪五年刊本。

〔清〕吴世熊修、刘庠纂《同治徐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吴存礼修、陆茂腾纂《康熙通州志》,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清〕吴棠修、鲁一同纂《咸丰清河县志》,清同治四年续刻本。

〔清〕吴翀修、曹涵纂《乾隆武清县志》,清乾隆七年刻本。

〔清〕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清嘉庆十五年刊本。

〔清〕邱沅修、段朝端纂《宣统续纂山阳县志》,民国十年刻本。

〔清〕胡裕燕修、吴昆山纂《光绪淮安府志》,清光绪二年刊。

〔清〕胡宗鼎增修《康熙宿迁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增刻本。

〔清〕高龙光修、朱霖纂《乾隆镇江府志》,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

〔清〕唐仲冕修、清汪梅鼎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清嘉庆十六年刊本。

〔清〕凌寿祺纂修《浒墅关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

〔清〕孙云锦修、吴昆田纂《光绪淮安府志》,清光绪十年刊本。

〔清〕马得祯纂修《康熙鱼台县志》,清康熙三十年刻本。

〔清〕敖立榜修、秦永清纂《雍正故城县志》,清雍正五年刻本。

〔清〕秦瀛纂《嘉庆无锡金匱县志》,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清〕徐宗干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清咸丰九年卢朝安刻本。

〔清〕许治修、沈德潜纂《乾隆元和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清〕郭琇修、、运隆纂《康熙吴江县志》,北京:康熙刊本。

〔清〕陈奠纘修、倪师孟纂《乾隆吴江县志》,乾隆十二年刊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清〕陈懋修、张庭诗、李培纂《光绪日照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清〕陈庆蕃修、叶锡麟纂《宣统聊城县志》,清宣统二年刻本。

〔清〕张之洞修《光绪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

〔清〕张廷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清〕张德盛修、王曾禄纂《雍正高邮州志》,钞本。

〔清〕黄宅中修、冯庆杨纂《光绪吴桥县志》,清光绪元年刊本。

〔清〕杨宜仑修、夏之蓉纂《嘉庆高邮州志》,清道光二十五年范凤谐等重校刊本。

〔清〕崔志元修、金左泉纂《道光铜山县志》,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清〕嵩山修、谢香开、张熙先纂《嘉庆东昌府志》,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清〕邬承显修、吴从信纂《乾隆邳州志》,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清〕赵宏恩纂《江南通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07-518册。

〔清〕郑澧修、邵晋涵撰《乾隆杭州府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清〕董用威修、鲁一同纂《咸丰邳州志》,清咸丰元年刻本,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清〕蔡寿臻修、钱锡霖纂《光绪武清县志》，清光绪七年修钞本。

〔清〕刘浩修、徐锡麟纂《光绪重修丹阳县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清〕薛柱斗纂修、高必大纂《康熙天津卫志》，民国 23 年铅印本。

〔清〕魏瀛修、刘炳纂《康熙青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卫哲治修、顾栋高纂《乾隆淮安府志》，清咸丰二年重刊本。

〔清〕觉罗普尔泰修、陈顾联纂《乾隆兖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于书云修、赵锡蕃纂《民国沛县志》，民国 9 年铅印本。

余家谟修、王嘉诰纂《民国铜山县志》，民国 15 年刊本。

李佩恩修、张相文纂《民国泗阳县志》，民国 15 年铅印本。

高步青修、苗毓芳纂《民国交河县志》，民国 5 年刊本。

今人论著

唐寰澄：《中国科学史·桥梁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夏锦文、韩显红主编《近代大运河史料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

曾孜荣：《大运河：从北京出发，下江南》，北京：中信出版公司，202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简锦松：《山川为证——东亚古典文学现地研究举隅》，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

杜娟：《晚明画家张复的实境山水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页 277-288。

梅韵秋：《明代王世贞〈水程图〉与图画式纪行录的成立》，《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4，页 109-158。

汤宇星：《风景的记忆与象征——钱穀〈纪行图〉与陆治〈临王履华山图〉考释》，《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14 年第 9 卷第 35 期，页 37-45。收入李安源编《与造物游：晚明艺术史研究》，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页 57-68。

陈远：《王世贞的〈水程图〉与明代大运河之游》，博士论文，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9。

叶雅婷：《王世贞的导览计划：〈纪行图册〉研究》，硕士论文，台北：台湾大学，2017。

叶雅婷：《明代的宦游文化——谈院藏〈水程图〉的纪实特色及其观众》，《故宫文物月刊》第 432 期，2019，页 82-94。

蒋方亭：《王世贞的舟行宦旅——明代吴门画家〈运河纪行图〉册研究》，博士论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7。

刘鹏：《钱谷卒年考》，《艺术工作》，2019，页 77-79。

简锦松、唐宸、李依娜、陈高中、吕希真：《诗人·长桥·GIS——姜夔〈过垂虹〉现地研究》，《东华汉学》第 35 期，2022，页 1-64。

简锦松、廖滋铭、唐宸、王勇：《明清时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之交通路线与 GIS 呈现》，《数字人文》2021 年第 4 号，北京：中华书局，2022，页 115-180。

简锦松：《明代大运河诗空间概念之新解读》，《台大中文学报》第 58 期，2017，页 1-52。

简锦松：《明代文集为什么需要大运河现地研究——以归有光〈壬戌纪行上〉154 字为例》，《斯文》第 7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页 112-128。

外国

[朝鲜]金致仁等纂《大典通编》，清乾隆五十年朝鲜内阁刊本。

[朝鲜]不着撰人《海东地图》，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1995。

[朝鲜]崔溥撰《锦南集》，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88。收入《韩国文集丛刊》正编第16册。

[日本]允澎撰《允澎入唐记》，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收入《续史籍集览》第一册。

[日本]冈千仞撰《苏杭日记》，张明杰整理《观光纪游·观光续记·观光游草》，北京：中华书局，2009。

[日本]桑原鹭藏撰《考史游记》，张明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日本]策彦周良撰《策彦和尚入明记·初度集·再渡集》，东京：大日本佛教全书发行所，1922。收入佛书刊行会编纂《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16册，《游方传 四》。

[越南后黎朝]阮辉懜《燕輶日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收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24册。

[英]G. R. G. Worcester, *Sailand Sweep in China*,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6.

An On-Site Study and Its GIS Present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by Qian Gu and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 by Zhang Fu of Ming Dynasty

Chien Chin-Sung Liao Hsiung-Ming Wang Yong Zhang Shujun

Tang Chen Yan Cheng Xie Dinghong

Abstract Qian Gu (钱穀)'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纪行图册》) was based on Wang Shizhen (王世贞)'s *Shi Jin Ji Xing* (《适晋纪行》)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Longqing reign (1570) in June and was painted into 32 scenes from Cangshan Xiaozhi Garden (仓山小祇园) to Yangzhou Yangzi Bridge (扬州扬子桥). Zhang Fu (张复)'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 (《水程图》) was drawn on the boat going north when Wang Shizhen entered the position of Taipu (太仆) in the second year of Wanli (1574) in February. He depicted 52 scenes from Shao Bo (邵伯) to Tongzhou (通州). Both works were done in a realistic style and are considered exceptional in the Ming dynasty's painting history. This article uses the on-site study method to undertake three tasks. First, since Wang Shizhen's trip to the north coincided with the Great Canal's changing period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Longqing Xinhe (隆庆新河)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Jiahe (汧河),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gitize all the waterways they passed through. Second, Qian Gu stated that he wanted to record the true landscape at that time, so this article uses travel diaries, local gazetteers, ancient and modern maps, and my own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the on-site study to explain each illustration and verify the degree of realism depicted by the painters. Third, the value of the more than 80 scenes is like discovering a large box of Ming dynasty videotapes. This article will reveal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Great Canal in the Ming dynasty in a visual and expressive manner through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cenes.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The Great Canal of the Ming dynasty; Qian Gu's *Painting Album of the Great Canal Journeys*; Zhang Fu's *Visual Travelogu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Waterways*